

● 人才档案录丛书 ●

主 编：蒋蕊娟

# 人 才 史 话

俞前 张明观 李炳华等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才史话/蒋蕊娟主编.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3

ISBN 7-80139-214-0

I. 人… II. 蒋… III. 人物—生平事—中国—  
古代 IV. 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156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4 月 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1—3100

定价:13.50 元



# 目 录

序一 .....	张学忠 (1)
序二 .....	孙长贵 (3)
序三 .....	蒋蕊娟 (5)
张翰思鲈 .....	俞 前 (1)
顾野王忠勇报国 .....	俞 前 (4)
谢涛荐才甘受连坐 .....	俞 前 (6)
王莘面君论治国 .....	俞 前 (8)
沈启调查研究成《水考》 .....	周世德 (11)
卜梦熊肇始盛泽地方志 .....	李炳华 (14)
真可从佛 .....	俞 前 (16)
俞安期踏蛙立志 .....	俞 前 (18)
沈璟辞官 .....	俞 前 (20)
周宗建首劾魏忠贤 .....	李炳华 (24)
计成《园冶》屈遭磨难 .....	俞 前 (27)
卜舜年恃才傲物 .....	李炳华 (31)
叶门醉文 .....	俞 前 (34)
吴晋锡教子成材 .....	俞 前 (37)

吴易抗清·····	俞 前 (40)
柳如是守节·····	俞 前 (44)
计东对人生的不息追求·····	李炳华 (48)
潘桂章编史·····	俞 前 (51)
王锡阐矢志数学天文学·····	殷堰工 (54)
孙云球制镜·····	俞 前 (57)
吴兆騫出塞·····	俞 前 (59)
徐钊潜心词学·····	倪 明 (63)
潘耒刻印《日知录》·····	俞 前 (67)
徐灵胎医道垂青史·····	吕锦华 (70)
吴树臣秉公执法诛王五·····	俞 前 (74)
陆耀洁身自律·····	俞 前 (76)
陆恢从学众师·····	俞 前 (78)
翁广平补修《吾妻镜》·····	俞 前 (81)
倪寿芝输财办学·····	王福荣 (84)
汪鞠如革新技艺兴绸业·····	李炳华 (87)
蔡寅壮志辛亥·····	得 龙 (90)
陈去病有功乡邦文献·····	顾美珍 (93)
金松岑造意《孽海花》·····	顾美珍 (96)
施肇基外交显才干·····	李廉深 (99)
郑辟疆的油灯人生·····	周德华 (102)
郑之蕃悉心数学教育·····	殷堰工 (104)
柳亚子二遇孙中山·····	张明观 (106)
王绍鏊忍辱负重为革命·····	吴 文 (110)

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 .....	孙世光 (114)
金诵盘拒绝赴台湾 .....	王光远 (117)
金国宝翻译列宁著作 .....	钟 风 (120)
范烟桥考证《过垂虹》诗 .....	张明观 (122)
孙本忠改良蚕种 .....	周德华 (124)
徐蔚南论战金松岑 .....	李炳华 (127)
严宝礼初创《文汇报》 .....	吴 文 (130)
毛啸岑参与编辑《新黎里》 .....	张 帆 (135)
张应春血溅石头城 .....	顾美珍 (138)
殷明珠投身电影界 .....	张 帆 (141)
费巩任教浙大 .....	唐云海 (143)
钱康民太湖捐躯 .....	刘 双 (146)
刘天韵评弹生涯 .....	刘 双 (149)
孙世实舍命救同胞 .....	唐云海 (152)
沈月箴无私奉献评弹艺术 .....	徐佑永 (155)
沈波忠心向党 .....	徐佑永 (159)



由吴江市人事局局长蒋蕊娟同志主编的《人才启示录》丛书如期付梓，我作为一个同行，倍感欣喜。

蒋蕊娟等同志，长期从事基层人事工作，无论是发掘人才，还是服务于改革，他们都将一般事务性的工作紧搭在社会进步的脉搏上，其间一定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这一点看，这套书是“基层人写”和“写基层人”，这对于如何做好基层的人事工作，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谈”。今年春天，我在会议间隙，到吴江实地考察了那里的人事工作，他们的努力和做出的成绩令人倍受鼓舞。

当前，我们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人事工作“两个调整”，深

化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加快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步伐，开展“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活动，建设好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支队伍，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事人才保障。

这套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吴江人写”和“写吴江人”，编撰角度新颖，因而书中所论及的人、事无不带着江南润土的气息。

吴江地灵人杰，群英荟萃，曾走出许多诸如柳亚子、费孝通这样的知名学者。然而，他们所处的年代，只是一个人才自生自灭的历史阶段。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我们这些从事人事工作的干部来说，就是从这一古老的土地上，发现、发掘、培养出大批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这大概就是蒋蕊娟同志编撰《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初衷吧。

是为序。

1996年12月26日

---

张学忠同志为国家人事部副部长。

《人才启示录》丛书是吴江市人事局向社会奉献的一部佳作，其品位，感同非凡！

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早在几年前，吴江市人事局就创造性地站在人才发展的战略高度，创办了《人才》报，并通过这张报纸以及多种媒体，颂扬历史，反映当代，全面、系统地展现吴江人的精神风貌，以其浓厚的吴越乡情雅集了一大批海内外英才贤士。《人才启示录》丛书的面世，无疑给人们以启示，为读者迷津指途，为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才启示录》丛书既以其真实、鲜活的内容体现出激人发奋的正气，又凝沉着赏心悦目的雅气，有其独特的风格；超越寻常，高瞻远瞩，开拓了行政地域和行业界限的视野，着力揭示了人才成长的普通规律。

因此，丛书给广大人事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又不失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也是人

们用以教育后人的好教材。这正是我为其高兴之所在。

吴江，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颇具现代特色。相信《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出版，又是一次很好的体现和弘扬。

1996年11月于南京

---

孙长贵同志为原江苏省人事厅厅长。



近年来，日益深化的现代意识，使得人们对人才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感到越来越不可轻视，有的人已经乐意将它强调为各项事业兴盛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意识在我看来一点也没有过分。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人，我一直认为，古今中外由人才造就的喜怒哀乐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很值得思考、借鉴。每当不肯放弃这种念头时，我总希望能够通过某种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比如采取富有人文色彩的形式——来补偿具体事务性工作所不能尽力的部分，于是，《人才启示录》丛书就在这样的心愿驱使下开始编撰了。

想要完成这样一项不小的文化工程，而且期望丛书的品质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行家的评鉴，确实不是轻松的事。好在有一个特别的基础，那就是我负责编刊的《人才》报，其栏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具有启发和教育的意



义，也受到过读者的喜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在选编中也注意到，凡是对现实启示作用不明显的文章一律不用，凡是写历史的文章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凡是纪实的作品都应是第一手资料。这些原则，也就构成了丛书的基本特色。

《人才启示录》丛书共分为六册，分别是《谈人说事》、《名人画廊》、《骄子风采》、《走向卓越——自己的故事》、《人才史话》和《凡人风华》。在体裁上主要是言论性的杂谈、人物散记、报告文学、自述性传记、笔记小品和随笔，力求在阅读时能够轻快、活泼一些。

我们承认，编撰像这样一套从人才角度来论及社会、人与事的书籍，因缺少参考资料，不免显得稚嫩，加以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存之必然，当请读者朋友指正。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是他们在丛书的编撰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996年秋于退思园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西晋文学家张翰的这首《秋风歌》，在吴江几乎妇孺皆知。张翰思鲈归乡成为千古美谈。

张翰（约258~319年间在世），字季鹰，世居吴江二十九都（今吴江莘塔境内）。生卒不详，约魏甘露三年至晋太兴二年在世，年57岁。父张俨，官为吴国大鸿胪，掌接待兵客等事。张翰才华盖世，善著文辞，下笔神速，辞意新丽，且放纵而不受拘束，当时人称江东步兵。晋朝官吏贺循奉命前往洛阳，途经苏州阊门，于舟中鼓瑟弄琴，张翰竟为琴声所迷，随舟同往洛阳，后被荐为齐王司马冏幕僚，晋惠帝太安六年（302年），受封大司马东曹掾。

然而，正当张翰仕途得意之时，忽感秋风萧瑟，于是，思念起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来，叹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



张翰



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归故里，于吴江莘塔枫里桥畔建起别墅，朝暮饮酒作诗，其宅东面水，即后人所称“莼鲈港”。张翰 61 岁卒，墓在莘塔二图村，当时有墓碑，上刻“晋高士张翰之墓”字样。墓碑今已不存。

其实，张翰假“思鲈”而隐退归乡，是为了避祸。当时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朝野不服。特别是晋武帝死后，诸王间又发生大混战，齐王冏得志，骄奢擅权，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嬖宠用事。南阳处士郑方曾上书司马冏有“四失”，其中第一失即为“安不虑危，燕乐过度”，司马冏不听。大司马户曹掾孙惠也曾向司马冏指出“五难四不可”，司马冏仍不采纳，孙惠见其刚愎武断，不听忠言，便辞官而去。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张翰。张翰曾对同朝为官的吴郡同乡顾荣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智自防。”这才是张翰借故归乡的真实内情。

张翰归乡后，司马冏果然兵败被杀。张翰借思念家乡菰菜、莼羹、鲈鱼脍之名，回归故里，不仅避免了祸害，而且在文章学问上得以再造。他的《首丘赋》数十篇誉满乡里，并著有文集二卷传世。他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性情旷达，实属难能可贵。

宋乾道三年（1167 年），吴江县令赵伯虚筑三高祠，将张翰与范蠡、陆龟蒙并称“三贤”。

梁太清三年（550年），东魏大将侯景作乱，攻破南京，繁华的京城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尔后，侯景率军横行三吴，自称汉王，所到之处屠城洗劫，肆虐无比，姑苏城也危在旦夕。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南方士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起兵保卫郡府。当时正服丧在家的太学博士顾野王，也以弱小身躯，杖戈披甲，募乡党坚守苏州，殊死抵抗侯景乱军。

顾野王（519—581年），字希冯，吴江人。7岁诵“五经”，9岁作诗文，后入扬州刺史宣城王府作幕宾，曾画古贤像于王府。他的画和辞学家王褒的字时人称为二绝。他才华服众，深得宣城王赞赏，后为太学博士。

顾野王于国难当头，舍身忘己，在讨伐侯景乱军阵前，慷慨陈词，明君臣之义，斥叛乱之逆，一时使乱军仓惶失措，令义兵斗志旺盛。气势之大，持论之正，大显忠志之士本

色，虽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败走，但其忠勇报国、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千古传唱。

梁亡入陈，顾野王又以其才学品德，任国子博士、黄门侍郎、光禄寺卿等职，卒后陈后主追其忠勇，赠秘书监、右卫将军等衔。存世著作有《玉篇》30卷，《舆地志》30卷，《符瑞图》10卷和《分野枢要》、《续冥洞记》、《玄象表》等。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顾野王在梁亡陈兴的历史变迁中，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以一介书生，挺身而出，临危而不惧，深受后人颂扬。



# 谢涛荐才甘受连坐

俞 前

公元 998 年，宋真宗即位，在朝廷选出 24 位有治国政绩的官吏，给门下省使用，其中有一位叫谢涛的。

谢涛（959～1034 年），字济之，吴江同里人，自幼聪颖，14 岁就能讲解《春秋左氏传》，当时，正巧刘继元召集吴中名士作表章，许多人写了，他都不满意。谢涛私下也写了一篇，刘继元见后大惊，对谢涛的才华甚是佩服。此后，谢涛结交了不少名士，与吴县知县罗处约、长洲知县王禹偁等过从甚密。罗处约曾对王禹偁夸耀说：“济之吾曹敌也”，褒赞之意溢于言表。淳化三年，谢涛中进士，后任益州华阳知县。时值战乱刚息，田地荒芜。皇帝有诏书，凡谁占田而能加倍交付税租的，此田就归谁。于是大批良田均为豪绅霸占，流民无田可耕，生活艰难，谢涛上任后，上书皇帝，请下诏将田地退回原来的主人，使流民安居乐业，以保天下太平。因任职有功，后谢又升迁

著作佐郎。

谢涛，作为24位有政绩的官吏之一，在长春殿得到真宗皇帝的召见。后又被外委安抚益州、利州等地。在安抚中，谢涛重贤才，勤考绩，回京后，一下子向朝廷荐举了三十余人。时任宰相的毕士安认为他推荐的人太多了，言下之意恐有庸者，谢涛说道：“有罪愿连坐”，即如果他推荐的人犯了罪，他甘愿一道受处罚。他的不顾个人安危，大胆举荐人才的行动，得到了同朝众官的称赞。宋朝法典中有推荐官员需连坐的条例，就是从谢涛开始的。

谢涛深知“王业须良辅”的道理，积极向上推荐人才，而自己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宋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卒，为护送圣灵，有人提出要拆掉城墙房屋，以便灵驾通过。当时谢涛就指出，先帝在时，出城外主持封祀大事，好带仪仗，物品很丰，尚未拆去一间屋、一垛墙，今先帝遗诏要从俭薄殓，如此奢侈的陪葬器物，且要劳累州县百姓，这已经违背了先帝意旨，何况还要拆墙毁宅，请“裁损之”。保住了城墙房屋。

谢涛荐才甘受连坐，在人才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王莘（1082～1153年），字信伯，吴江震泽人。南宋绍兴年间曾任右迪功郎、著作佐郎、常州通判等职。

王莘幼时即过继给伯父王伯起，因王伯起曾向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学过经学，向文学家曾巩学过文学，与曾公亮父子交游，王莘小时就耳濡目染，学业多受名人点拨。后伯父王伯起又将其荐往洛阳，向哲学名流程颐、程颢“二程”求学，王莘的诗文、理学大有长进，一时与杨时相提并论，世人曾称誉“后来师门成就者惟莘耳”。

王安石变法后，王莘未能去求取功名，但其日积渐深的学问传闻于官宦名流。建康南渡，宋高宗赵构驾临平江府，知府孙佑便向丞相赵鼎推荐王莘，说其“素行高洁，有忧时爱君之心，开物成务之学。”赵鼎爱才，曾荐岳飞出师收复襄阳，今听说王莘有此才干，且目下又是用人之时，即向高宗保奏了王莘。



王莽面君论治国



高宗闻奏，便召王苹进见，并询问其有何治国之道。王苹即直言治国有三策，一为正心诚意，二为能辨君子小人，三要除朋党。他当着文武大臣，侃侃而谈，述国家兴亡之原因，明君臣之大义，针砭时弊，直抒己见。高宗喜其直率，且又满腹经纶，当着左右大臣，夸王苹“出生平民，谈吐自如”。又称读书人就应当通时务，明世理，方算有用之才。随即封王苹为右迪功郎，并赐进士出身。

王苹的功名，虽不是科举场上争得的，但同样显露了他的真才实学，特别是面对南宋朝廷奸臣当权，君主昏庸，他能一针见血地斥责，更是难能可贵。在他任著作佐郎、常州通判、台州崇道观任上，多次因直言不讳而得罪秦桧，屡遭报复，但他不畏不惧，充分显示了他的胆识和品格。后来，因其年仅14的侄子王谊在书斋中作《罢相论》，并拈纸作御批“可斩秦桧，以谢天下”，被仆人告闻于朝，侄被逮入狱，王苹也被连坐罢官，成为一介平民。王苹罢官返乡，研究理学，著《论语集解》、《古今语说》及文集4卷，并指授弟子与乡里儒士研究经史，探及理学，终成儒林名士。他的弟子陈长方、杨邦弼继承了他的学说。后来曾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的沈羲甫，称王苹、陈长方、杨邦弼为“三贤”，并在震泽建“三贤祠”以纪念。

沈启（1490～1568年），字子由，号江村，吴江松陵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举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授职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后知绍兴府，又迁湖广按察副使，终因不善迎奉，三十二年（1553年）罢官归里，筑室结诗社自娱，晚年居仙人山，从事著作，78岁卒。

沈启传世著作颇多，除最具代表性的《吴江水考》和《南船纪》外，还有《南厂志》、《牧越议略》、《家居稿》、《南北稿》、《西台净稿》、《越吟稿》、《焚吟稿》、《鸡窠岭稿》、《杜律七言注》、《晴窗便览》等。

沈启盛名当在水利，然其重实际、强调查的处事为文态度，贯穿一生。在他任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时，他长于规划善于理财，为朝廷节约开支每年达十万余银两。据说有一天吏部侍郎询问户部粮食库存，户部答不出，又问兵部兵员额，兵部郎也答不出，在旁的一位官员



说沈启知晓，吏部侍郎不信，叫沈启来一问，果然对答如流，一清二楚，吏部侍郎十分惊讶。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皇帝南巡，当时南京工部认为，如大修皇船而皇上改道则空耗财币，若不加修缮而皇上突然临幸，则又将获罚，尚书宋公正彷徨无计，而沈启即进建议，说可召商人运材料到龙江船厂，同时派急驿不断探报皇上行踪，如大修皇船则付给商人材料价款，若不修则将材料退还商人。结果，皇上改从陆道，而工部财币无所耗损，此举即省银十数万两。

由此，尚书对沈启十分钦佩和倚重，对其往往不以官职或姓名相称，而称“先生”。沈启为官有廉德，为人有风骨，注重调查，讲求实际，在他外放浙江绍兴府期间，因所属八县中会稽、新昌、萧山三县赋税与田亩不符，曾亲自调查，踏山涉水，解决了历史上就遗留下来的难题，又先后解决了“山田苦干旱，城厢多火灾”的实际问题。浙江巡抚朱纨很赏识他的政绩和才识，称其为全省官员中的“第一人”。

尽管沈启不善迎奉，因向朝廷提出“海禁四议”，最后与朱纨一起被劾罢官，但他重调查，讲实际的态度，为后世所赞颂。特别是他回归乡里，目睹吴江洪水泛滥，庐舍淹没，民不聊生的景象，立志消除水害，以年迈之躯，踏遍沿太湖二百多个湖荡，上千条河流，查清吴江水患之源，著成近百万字的《吴江水考》，在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万历五年（1577年）

巡按御史林应训所著《三吴水利考》，崇祯八年（1635年）巡抚都御史张国维所著的《吴中水利全书》，均效法沈启的《吴江水考》。清代名士徐大椿在《重刊吴江水考后序》中称沈启的书是“东南水利不刊之典”，称沈启“不执古以律今，亦不泥今而忘古，总以不塞水性，有益田畴为本。”不仅是对沈启《吴江水考》的评介，也是对他为人处事的评介。



盛泽是一个丝绸名镇，素有修志传统。一个小小的江南市镇，三百多年来，所修的地方史志卷帙浩繁，不下十数种之多，这在地方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而在众多的修志者中，其肇始者是明代的武举人卜梦熊。

卜梦熊（1536～1601年），字仲登，号景川，吴江盛泽人。幼时读书超敏，10岁时已于书无不窥。善作辞赋，倚马千言。又酷爱习武，腰佩宝刀，身跨骏马，射原上狡兔、空中苍鹰，飞骑之下，常常是“毛血洒平芜”。兴来时推案舞剑，直舞得“有剑无人，有影无形”，当剑归鞘时，仍鸣吼不休。在南京参加武举考试时，因武艺过人，三试三魁。会试时，考官许董读了卜梦熊的试卷，叹息道：“真是天下奇才，可惜策语过激！”竟不能将他的试卷进呈。卜梦熊因此名落孙山。

仕途失意，卜梦熊自勉说：“我不能躬政，但可以达观天下！”于是他穿着武士的服饰，



骑马踏遍塞内塞外。东赴鸭绿江，北上雁门关，西至凉州、宁夏，南下匡庐、武当。广泛的游历，使他深入各地的军旅生活，既饱览了“河海之浩荡”，又亲见“甲兵之雄富”，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年过五十，他才回到家乡，决心杜门著书。他将平生考察研究军旅所得的体会，著成《武经髓》、《防倭防国志》、《古今陈变兵变》等书。同时，他目睹盛泽丝绸业的迅速崛起，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市镇的经济文化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探究。他广泛搜罗资料，实地踏勘，常常驾着扁舟一叶，纵览盛湖景物，甚至“夜宿兰若而不归”。经过他的刻苦努力，终于撰成了盛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盛湖志》。可惜的是，这部《盛湖志》在他生前未能刊行，在他死后志稿散佚而不可复得。尽管如此，这部志书中的部分篇章，如《盛川题景记》、《盛湖八景诗》（共十六首）等还是流传了下来。特别是《盛川题景记》一文，详尽地记载了盛泽发祥前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民俗、风情的巨大变化，成为研究吴江丝绸发展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真可从佛，完全是一种偶然。

真可（1543～1603年），俗姓沈，字达观，号紫柏，江苏吴江人。少时豪侠义，与分湖名士袁黄关系甚密。当时袁黄家中藏书颇多，真可得以一一细读。读书间常常幻想到边塞建功立业。明嘉靖年间某天，忽然仗剑远游，恰逢天降大雨，在苏州阊门避雨遇上云岩寺明觉和尚，一见如故，真可即随明觉入寺，夜听寺僧诵读八十八佛名号，心灵感应，顿生皈依之心。于是，第二天即拜明觉为师，剃发出家，法号真可。

真可闭门苦读五载，熟谙佛经，20岁受过具足戒后，开始云游。先在武塘景德寺广研教经，后入庐山学法相深义，再到五台山受老宿指点。明万历元年（1573年）至京城参禅师僧偏融，万历三年（1575年）又至嵩山少林寺谒见大千常润。真可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此时已成为有名僧人。

他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十分重视佛教教经。当他听说法本大师想刻方册《大藏经》又力不从心，便主动担负这份重任，他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先在山西五台山，后到浙江寂照庵，一直辛勤主持此事，他死后，剩下的工作由弟子继承。先后经历88年，至康熙十年（1677年），真可死后的74年才告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成果。《大藏经》刻本《万历藏》分“正藏”210函，“续藏”95函。

真可谙熟佛学，又深明大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高僧德清因受诬私创寺院罪被下牢狱，他多方奔走，四处争辩。二十八年（1600年）南康太守吴宝秀因违旨抗征矿税入狱，其妻陈氏哀愤自尽，他又赴京走动，帮助说话。当时皇太后信佛甚深，曾旨意真可将京城外西峪寺三粒舍利子迎入慈宁宫，真可还将皇太后供斋衬金赎回云居寺，太后佛事开支太多，神宗帝极为不满，迁怒于真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宫内出现了为郑贵妃说话谎传神宗要改立太子的文本，文本被定为“妖书”，真可被诬为“妖书”的作者之一而遭受牢狱之灾，受重刑后，在狱中念偈语，双手合十冥逝。

真可遗骸先葬于京西慈慧寺外，后迁浙江径山寂照庵，又迁文殊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焚化后立塔。

真可，在明末佛教界名望极高，与袞宏、德清、智旭并称明代“四大高僧”。

俞安期（1551～？），字羨长，出生于农家，年幼即随父种田。有一次父亲叫他送秧，不慎在田埂上踏死一只青蛙，收工后，发现那只青蛙四脚朝天仍曝晒于田埂，忽然有所思悟。翌日，其父又唤他下田，他却对父亲说：“儿不想去了。”父问他缘何道理，他说：“昨天孩儿踏死了一只青蛙，见那青蛙暴尸于田埂，无人问津，我想常人死后也会这般模样，不如勤奋苦读，求得功名，做出类拔萃之人，将来才能有所归宿，而名垂千古。”父亲虽然深感儿子讲话有理，但家中贫困，无资延请老师。俞安期立志求学，日日于附近私塾旁听。后来就生出了游学的念头，独自离开家乡，来到太仓一户大家门口。

守门人以为村野顽童，赶其走开，恰巧主人送客出来，见其眉清目秀，有一股文气居于眉间，问明原由，顿生怜悯之心，便留于家中，让一个名叫王凤洲的先生教授他。俞安期



勤奋好学，进步甚快。一日，王凤洲带其外出，遇到一群围猎的人争着以一只母鹿为题，作诗题咏，可惜无佳句。王凤洲也吟了一首，只是后两句不妥，甚为焦急。俞安期不由分说，也不管师道尊严，顺口唱道：“虽无头角异，不与犬羊同。”使众人皆感惊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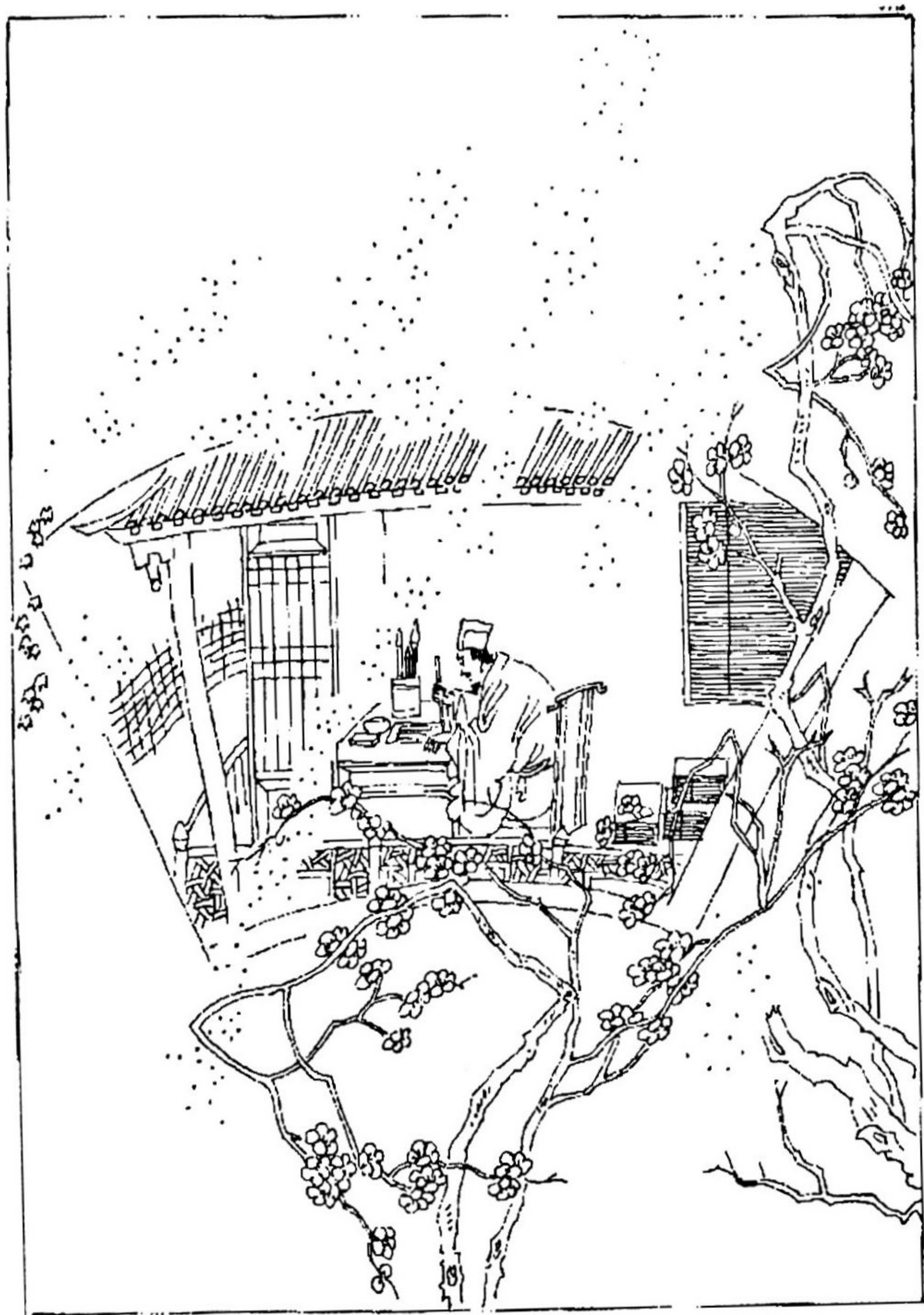
日后俞安期又徙居宜兴、南京，以布衣身份广交公卿大臣，知识累积甚广，终成一代名流，载入《松陵见闻录》。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以蓁蓁阁名刻行唐李屋《南北史续世说》。俞安期的主要著作，有《唐类函》200卷，《诗集类函》150卷，《启集类函》150卷，《类苑琼英》10卷等，均被选入清《四库全书》。

明代中叶，我国戏曲史上出现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临川人汤显祖，另一位是被尊为“曲坛盟主”的吴江人沈璟。

沈璟（1553～1610年），吴江松陵人，天资聪颖，21岁中举，22岁（明万历二年）在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得二甲第五名，赐进士出身，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但他不恋仕途，隐逸吴江，寄情词曲，致力于戏曲声律的研究并编撰传奇剧本，对中国戏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著作有《义侠记》、《博笑记》等17种，还撰有《古今词谱》等，诗文书法造诣很深，有“吴江沈氏，词人渊薮”之称。

沈璟的戏曲成就，是从辞官归乡开始创造的。朱万曙《沈璟评传》中记载了沈璟辞官的故事。

首先是遭贬。明万历十年，明神宗朱翊钧的王恭妃生下了皇子朱常洛，可4年后郑贵妃



沈璟辞官



也生下一位皇子朱常洵。按封建宗法制，朱常洛应是皇室法定继承人，可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皇太子而迟迟不立朱常洛。为此满朝大臣为“国本”而担忧，纷纷议论此事。沈璟于是给明神宗上了疏本，词恳言切，要求皇上赶快册认朱常洛为太子并晋封王恭妃为贵妃，这一举动触怒了明神宗，即降旨贬沈璟为行人司司正，从礼部仪制司员外郎下来，一下子降了三级，并借故差往吴江。这件事按例可以使沈璟看破仕途凶险了，但他忠心耿耿，忧国忧民，依然兢兢业业，第二年又迁为光禄寺丞。

然而他还是辞了官。就在他升为光禄寺丞的第二年，他忽然上书乞归，当时年仅 37 岁。当时他正值壮岁，且又是遭贬后复出升迁之时，为什么又要辞官归里呢？这里面有个复杂的背景。

沈璟入朝时，内阁首辅是张居正，当时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独揽大权，朝廷内部形成了内阁和言官相对峙的局面。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申时行接任，想平衡双方却已难做到，言官与内阁不断发生冲突。处于这种环境的沈璟，看透了封建官僚间的勾心斗角，他一方面仍兢兢业业勤勉于皇事，另一面却悄悄滋长归隐之心。他送好友姜士昌诗中有句“欲寄旭心与明月，随君一夜到吴江”。后来，在顺天府乡试中，作为同考官的沈璟因录取了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和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遭到言官的攻击，使他执持中立的政治地位彻底

崩溃。沈璟思考再三，决心辞官归隐。于是他在没有作任何分辩的情况下乞归故里，离开了内阁和言官纷争的朝廷，自号词隐，在吴江故乡寄情词曲，编著立说。他与周围一批戏曲家如王骥德、吕天成、叶宪祖、冯梦龙等共同研究，反对追求词藻华丽，提倡朴素语言，被后人称为“吴江派”，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





# 周宗建首劾魏忠贤

李炳华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十分之九的农民只能“为人佃作食力”。由于辽东战事紧急，明政府向人民加派“辽饷”，赋役十分沉重。政府还加强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派出许多宦官充任矿监税吏，向民间大肆掠夺金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掌握了政权，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当时一些正直的大臣，看到了明王朝的危机，激于义愤，纷纷起来与阉党作斗争，但无一不遭受残酷的迫害。而上奏首劾魏忠贤弥天大罪的，就是周宗建。

周宗建（1582～1626年），字季侯，吴江盛泽人，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周用的曾孙。他自幼即富有正义感，对奸臣严嵩不满。曾在父辈谈论中得知忠臣杨忠愍惨死于权奸严嵩迫害，而愤怒地叫道：“我去找他评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进士，历任武康（今浙江

德清)、仁和(今杭州)知县。因政绩优异,后升任监察御史。他晋京后,于天启元年(1621年)为遭受魏忠贤迫害而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等请封谥号。沈阳被后金(后改国号为清)攻破后,形势危急,他一边谴责当事大臣,一边请求皇上破格用人,召还被革职的名将熊廷弼,廷弼因此复任辽东经略。然而,广宁(今辽宁省)巡抚王化贞大言轻敌,不听调度,致使广宁失守,但是阉党庇护王化贞,而将罪责推给熊廷弼。宗建愤愤不平,为熊辩诬。在这种情况下,他决意上疏弹劾魏忠贤,历数魏的罪状,指出:“象魏忠贤之流,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却对他笑语频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长此以往,皇上势必“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见到宗建的奏章,皇帝一言不发,魏忠贤自然恨之人骨。后来事态不断扩大,魏忠贤组织人马,肆意诋毁宗建,并累及刘一景、邹元标、周嘉谟、杨涟等数十人,把他们悉数指为熊廷弼逆党。宗建深知祸害的根子在于魏忠贤,而他正受到皇上的宠信。他每虑及此事,往往彻夜难眠。于是他再次上疏直攻魏阉,将他妄杀无辜、残害忠良的罪行一一指数,并声称:“举朝噤若寒蝉,臣若顾惜微躯,天下事尚忍言哉!”疏文入宫后,魏忠贤大为惊恐,围在皇上身旁哭泣不止。昏庸的明熹宗竟下令廷杖周宗建,以解魏阉怨气。最终,宗建以接受熊廷弼13000两贿赂的诬告遭逮捕下狱,被魏忠贤毒打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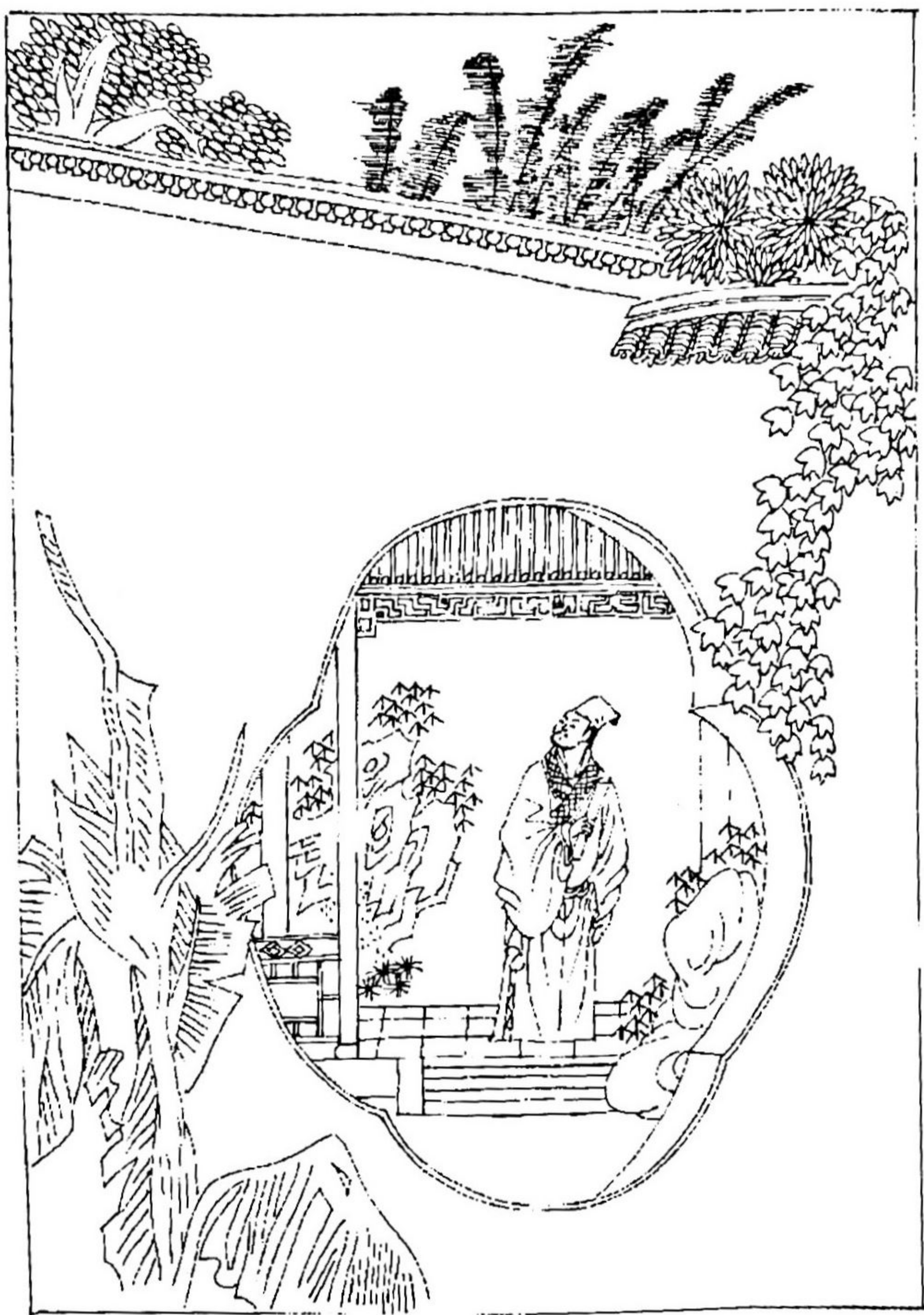
明天启七年（1627年）思宗即位，遂发觉魏忠贤奸情，下令逮捕，同年11月魏忠贤在阜成自缢而死。明崇祯二年（1629年）被魏忠贤迫害的受害者得到褒赠与昭雪。崇祯帝下诏赠周宗建为太仆寺卿。宗建的两个遗孤，由宋氏、韩氏分别抚养。福王时，宗建又被追谥忠毅。

周宗建正直为人，敢说敢做，在反对魏党的斗争中，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大无畏的精神令后世敬佩。



世界园林艺术最古老的名著《园冶》一书，出自明代造园艺术家计成之手。这本书在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刻本，瑞典造园学家奥斯互尔得·西润将其传入北欧，后又有英译本出版。

计成（1582~?），吴江人，号无否道人。幼年聪明毓秀，性喜山水风光、园林名胜，爱作诗作画，并游历了北京、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常在常州、南京、仪征一带寻访假山石。据传，在他定居镇江的某一天，在一片竹林之间，看到几个人在叠砌山石，其状不伦不类，毫无景致，便不禁失声发笑，且喃喃自语：“叠山之术，有真假之别……”旁人以为他说大话，叫他当场试试。计成二话没说，手起石落，几下堆叠，一座悬崖峭壁嶙峋之势即刻而成，使众人赞叹不已。此后，计成造园叠石的名声遍布镇江，为武进吴又予叠石造园，为仪征汪士衡营造花园住宅，颇得时人好评。明崇祯四年（1631年），他将自已造园心得写



计成《园冶》



成《园牧》3卷。

那么《园牧》又怎么改成《园冶》的呢？这里有一则轶事。当时，鞍山人曹元甫来仪征参观汪氏园林，见到园林艺术造诣很深的计成后，问是否可以用文字来表述汪氏园林的特色。计成听后即把平时造园心得整理成一大叠文稿，著名《园牧》。曹看后深深为图文并茂的文稿吸引住了。两人便坐到一起，促膝谈起我国的造园历史，造园实践。曹元甫认为该书不应叫《园牧》，既然是自己创造的，应叫《园冶》。计成欣然应允，对原稿加以整理后，正式命名为《园冶》，明崇祯四年定稿。

《园冶》一书明确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目的论，并指出造园必须“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全书分章论述园林艺术总体规划布局、园址选择、掇山和写景等设计原则，还详细论述了对“立基”、“柱杆”、“铺地”、“叠石”等具体做法，并配有各种插图232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园林艺术进行的全面系统论述。

《园冶》成稿后，引起了时任光禄寺卿的阮大铖的重视。阮大铖是安徽人，魏忠贤的党徒，明天启八年（1627年）御史毛羽健劾其媚事魏党而被罢官，崇祯二年（1629年）名列逆案，后赎罪为民，遣回故里，不久迁居南京。阮大铖虽人格低劣为世人唾骂，但其才学却声名颇大。当他看到计成《园冶》稿后，十分钦佩，请安徽人刘召手刻，《园冶》终于崇祯七年（1634年）成书，阮大铖还为该书作了序。但是因阮大铖的插手，



计成被看作“阮氏门客”，遭人白眼，《园冶》一书也被打入冷宫，与阮氏著作同被列为禁书。

然而，《园冶》的艺术成就是抹不掉的。它的出版引起了国外园林艺术家的高度重视，二十世纪初日本首先称他为“造园鼻祖”。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原在北洋政府任要职的董康及朱启钤两人先后从日本设法获得《园冶》残本，补充问世。时隔300年，《园冶》重新得到中国建筑界的正视，计成之名盛传于海内外。



天源裂地维，谷风改天颜。  
片舟若枯蚌，巨浪如活山。  
颠播盛湖中，吾神清且闲。  
强如众人心，平陆起波澜。

这是明代诗人卜舜年所写的《盛湖古意》一诗。盛湖，即盛泽的西白漾。诗中，将颠簸在浩淼盛湖中的一叶小舟比作“枯蚌”，将翻腾咆哮的巨浪比作一座座“活山”，笔法奇崛，取喻新颖。而诗人写自己身处颠簸的小舟中却神情自若，悠闲自得，更显得性格孤傲，浪漫无比。因卜舜年对盛湖的出色描写，后人将此湖别称为“舜湖”，成为一段佳话。

卜舜年（1587～1620年），字孟硕，号野水，吴江盛泽人，是武举人卜梦熊的长子。父亲对他自幼就严格教育，要他习蔬食，咬菜根，抱薪牧羊，甚至洗涤溺器，希望他将来成为栋梁之才。父亲去世时，他才15岁，不能自立。守孝3年后，到嘉兴去报考秀才。考官

颜云汉评卷道：“旁若无人，奇士奇士！”名列第一。颜云汉当面开导他说：“你居住在村落之中，见闻不广，不如到禾城来拜学识渊博的胡毅庵先生为师。”于是他师事胡毅庵，寓于东塔寺废房中。庙破屋漏，楼梯不全，但他每每青灯一点，勤读到天明。有一次，松江名士陈眉公访东塔寺，见到卜舜年，看了他的诗文，大加赞赏，认为前程无量，但又告诫他说：“你刻苦攻读，固然可嘉，但你不过学到了文采之末，千万不能自满。”他亲自传授卜舜年许多深奥的知识，使得这位年轻人大开眼界。可是不久，颜云汉北迁，陈眉公东归，卜舜年只得归居故里。

20多岁的他，回到家乡后开始目空一切，与人相处稍有不合即瞠目而去。于是大家认为他十分“狂倨”。然而他以此自喜，在家中大门上自书一联：“乡人皆恶，国士无双。”他的兴趣很是广泛，对于各类小艺杂技，无不精研。他专程去苏州向名师张怀仙学习吴歙，直到“尽摹其妙”。回盛泽后，每逢良辰美景，人群喧闹之际，他往往出现在街头，玉喉一发，如珠如圭，人头攒动的闹市顿时万人俱寂，欣赏他的出色表演。他洋洋得意，自命不凡。他的书画也十分出色，兴至时作画作书，飒然风生，烟云乱点，极尽变态之能事。人们重金向他求画，他拂袖而去，但遇到贫困者，他却慨然赠画，以此接济。他又生性好客，挥金如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在盛名之下，他不能自持，发展到出入平康，



与变童同居（同性恋）。有一段时间，他省悟到自己的行为不端，曾下决心改正。他自备一本记过簿，每当萌发邪念，就迅速记录下来，并自嘲说：“免得麻烦阴曹地府为我记录。”但最终仍不能转变，直弄得家徒四壁，无子而死，年仅 34 岁。

对于卜舜年这位绝顶聪明的人物，人们既赞佩他的非凡才华，又惋惜他的行为失检。直到他死后 200 余年，清道光年间的郑谅伯还出资替卜舜年重刻其文集《绿晓斋集》，认为他的诗文“不规规于绳墨，英华恣肆，令读者作蹶飞仙，摘明月之遐想”，“盛湖之人文之盛，实由先生启之”，但他因怀才不遇便自我作贱，是十分可惜的。卜舜年一生的是是非非，令人深思。

明代，汾湖边的北厍出了一门文人，父叶绍袁，母沈宜修，子叶燮，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季女叶小鸾，全家醉心于文学，歌咏唱酬，有《午梦堂全集》行世。

叶绍袁（1589～1648年），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曾任南京武学教授，工部主事。但他不熟识仕途，当时，有人劝他去拜访宰相顾秉谦，以求进取。他却说“怎能依附阉党，走私权门，即便早上谒见，夜授公卿，也不愿去。”后来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误国，以母老为由告归，隐居汾湖边，与妻儿一起赋诗文为乐，清贫度日。

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山东按察副使沈琉的长女，通经史，娴风雅，常与丈夫咏诗于灯前，不为贫苦愁忧。有次夫妻在灯下读鲍照《愁苦行》，叶绍袁想起自己身世，不由得感慨万千，沈宜修深知丈夫心之所念，反过来劝道：“不必为贫苦愁恼和忧伤，文中自有欢乐



叶门醉文



在，何须再去留恋那种惊心动魄的官场生活。”叶绍袁夫妇就是在文学中寻找乐趣而取得累累成果的。叶绍袁著有《于寥集》、《桐廬集》、《湖隐外史》等，沈宜修有《鹧吹集》、《梅花诗》等。他们的言行亦熏陶了子女，他们也都鄙薄功名利禄而热衷于诗文。

叶燮（1627～1730年），字星期，号已畦，自幼善诗，任笔所至千言立就。虽也曾进仕，但终因不能事从上司而被弹劾罢官。著有诗论《原诗》，认为诗的创作是诗人的胆、识、力与客观事物的情、事、理的结合。后应吴江知县郭琇之聘，纂修《吴江县志》，三月即成。

在叶家三个女儿中，长女叶纨纨见识高远，3岁即能背诗百篇，而且书法遒劲，有晋人风，著有《芳雪轩遗集》。二女儿叶小纨，除了能诗文外，更精于曲律，写有杂剧《鸳鸯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戏曲家。三女儿叶小鸾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又是最有才气的姑娘，而且美貌如仙。6岁由其舅母、明末戏剧家沈自征之妻张倩倩抚养，7岁时已能吟诗作对。10岁时回娘家。那日值秋末冬初，她与母亲于灯下夜坐，门外风吹竹林，潇潇作响，帘前月华如水，沈宜修突出一对：“桂寒清露湿”，小鸾当即接口说：“枫冷乱红凋。”贴切工整，为其母大赞一番。叶小鸾还善画山水，写落花飞蝶更是别有韵致，著有《疏香阁集》。只可叹红颜薄命，17岁时就英年早逝了。

叶门醉文，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篇章。

清兵入关南下，神州陆沉，山河破碎。吴晋锡见明朝大势已去，事无可为，便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初四日痛哭一场，入九疑山为道。

吴晋锡（1599～1662年），字兹受，吴江松陵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吴洪、吴山都曾任过刑部尚书，吴中人称之为大、小尚书。吴晋锡于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授永州推官。处理政务以“豪强则剪之，小民则爱之护之”，平反冤狱甚多，政绩丰卓。清兵入关前，他上疏明廷请皇上圣驾亲征，圣上不听，永州被破，他也成了亡国之奴。

清廷为安抚明朝遗民，且闻其颇具才学，多次遣人招降，并以广西提学道之职委之。可吴晋锡坚辞不就，后又以“归省亲墓”请求放归。清廷无奈，只得应允。吴晋锡便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十七日启程返乡，回到吴江。



其师倪长圩见其一身道服，知其已存出世之心。就劝他说，国已破，山河已碎，出家又有何用？不如教子成材，方不辱吴氏诗礼传宗一门望族之称。倪长圩明事理、晓道义的一番话，终使吴晋锡脱去道服，将毕生精力付诸教育子女。

其实，吴晋锡在入仕前，就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石湖山房是其父子读书之处，垂虹桥边是其父子吟古怀今之地。且吴晋锡又十分看重从师就业，专门请了江左名流吴伟业和乡里奇才张九临担任子女们的老师。

这次归乡，得其师倪长圩的教诲，对子女们更加严格要求，尽心教导。特别是对他的四子吴兆騫，更是共坐楼头，不论风晨雨夕，酷暑严寒，谈经论史，赋诗作文，苦教不止。这样的父陪子读，使得吴兆騫学业大进，最终成为一代边塞诗人。吴晋锡在给儿子信中曾这样写道：“吾历几辛勤，教汝成名，自以为极天伦乐事。”可见，吴晋锡已把教育培养子女成才看成自己的天伦之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晋锡的子女们在他的培养教育下，都成为一代人才，除四子吴兆騫外，长子吴兆宽有《爱吾庐诗稿》、《古番堂文集》、《江楚纪游集》等著作传世；次子吴兆宫参加“慎交社”，文采风流，一时曾为“江浙坛坊之冠”；五子吴兆宜更是著作极丰，有《茹古斋诗文集》、《庚子集笺》等六种；就连七女吴文柔，也以工诗、尤擅填词之才，嫁与杨维斗之子杨焯；



三子吴树臣学业功名俱就，曾任刑部员外郎。

吴晋锡于明亡后，能避世而不忘人世，以培养教育子女成才为乐事，最终为中国文学史和吴江人才史浇灌出一丛艳丽的奇葩。



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兵在陕西击败大顺军后，开始向南方进攻，由于清朝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收缴民间兵器及严令剃发，江南各界人士异常激愤，各地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在太湖流域活跃着一支抗清义军，从首领到士兵，人人都用白布包头，人称“白头军”。它的抗清声势闻名江南，其首领便是吴易。

吴易（1612~1646年），字日生，吴江松陵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隐居家乡不仕。清兵入关，他义愤填膺，将“讨贼复国”四字贴于门上，作为誓言。清顺治元年（1644年），他与好友孙兆奎到扬州投奔史可法，上呈《中兴末议》。孙兆奎，字君昌，与吴易同中举人，对军事学说有所研究，史可法对他们很赏识，荐吴易任兵部识方司主事，兼监军。翌年四月，史可法命他率船队赴江南筹集粮草。不料，吴易回到江南，扬州已被清兵攻破，史可法慷慨殉国。吴易当即开赴吴江，



吴粵抗清



扎营太湖。五月，他聚众数千人在太湖打出义旗，起兵抗清，成为江南第一支抗清义军。吴易奋力抗清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柳亚子先生《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中所记八坼、汾湖两役更是惊心动魄。

八坼一战是在当年六月。吴易得知清朝晋王之子福贝勒要经过吴江，就派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在八坼伏击。八坼是运河要道，两岸是浩漫无际的塘河，进可攻，退避塘河又有苇丛遮蔽，是伏击的有利地形。当时，福贝勒率兵攻陷了嘉兴，正气势汹汹开往苏州，哪知刚至八坼，忽然两岸塘河一阵枪响，清兵一下子倒下了一片。正巧福贝勒所率清兵没有枪手，火炮又够不着，手中的刀枪等于烧火棍。于是福贝勒只能命令放箭抵抗。刹那间，矢如飞蝗，纷纷射向岸边塘河。吴易当即令义军用船板阻挡，然后效法诸葛亮“草船借箭”，竖起许多稻草人，获得许多箭，然后弯弓反射，枪、箭并发。清兵死伤无数，不敢恋战，夺路狼狈逃窜。白头军获得大胜。

汾湖一战是翌年三月。白头军遭重挫，吴易只身泅水脱逃，在汾湖重振义军雄风。苏州巡抚土国宝为根除后患，派副将汪茂功前往汾湖扫荡。二十六日，双方在汾湖开战，吴易凭借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施用游击战术，用迷魂阵扰乱清兵，清兵拼命抵抗，最终被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白头军趁胜追击，一直追到梅墩、

庞山湖等地，前后达四十余里。据《湖隐外史》记，这次战斗白头军杀俘清兵二千人，斩其巨魁，遁去者二、三千人。这是白头军抗清的最大战役，大振了义军抗清的士气。吴易因此被南明隆武皇帝授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后又晋封为忠义伯。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吴易在嘉善被清兵俘获，初九日从容就义于杭州草桥门。他举旗抗清虽仅一年多时间，但其抗敌御侮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心惊胆颤。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劝其自尽，并表示愿意奉陪。钱佯为应允，率家人故旧载舟于常熟尚湖。可直到夕阳西下，钱谦益仍纹丝未动，只是凝视着西山风景，用手探了探湖水，说：“水太凉了。”柳如是见其模样，忽然转身，独自往水中跳去。幸被家人及时拖住，未做孤魂独鬼。

看到平时满口豪言壮语而到头来贪生怕死的丈夫，柳如是气恼万分。回家后，她又为钱准备了刀子和绳子，让他要么自刎，要么自缢，说这样才能保住志臣烈士的名节。可他还是不依。五月，多铎兵抵南京，钱谦益率先出降，并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廷功臣，后又北上受封清礼部右侍郎之职。清兵南下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都要携妻北上，独柳如是不肯随从。作为曾沦落青楼的一代名妓柳如是，在民族气节和所谓荣华富贵中选择中，其举动为后





柳如是守节

世敬崇。

钱谦益，江苏常熟人，万历年间进士，诗文声名颇盛，儒雅风范惊人，“凡奏疏制议，偈铭状词，局格恢张，典雅蕴蓄，明清两代，无以超其上者”。柳如是（1618～1664年），吴江盛泽人，自小被卖到当地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如是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书得虞世南、褚遂良之笔法。年稍长，姿韵绝人而流落青楼。在松江，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崇祯十三年（1640年），柳如是敬慕当时有“李杜”之称的钱谦益，很想“一见其风采”，于是驾舟去常熟，以诗投赠。钱得到如是诗，对其才华甚为惊奇，一见倾心。第二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还因如是常着儒服男装戏称其“柳儒士”，柳如是也自比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后钱谦益从军，如是亦欣然前往。她期望丈夫能为国立功，在行军中意气风发，宛如昭君出塞。

然而，钱谦益心灵深处的贪生怕死、以及甘为清臣的所作所为，使柳大失所望。柳虽为一代名妓，但其志甚为刚烈。

《盛湖志补》曾记载：柳如是与宋辕文关系很好，后宋因受夫人责备而与柳远，柳便专门准备古琴一张，镂刀一口，邀宋相聚。相聚间，如是忽然问他：“为今之计怎么样？”宋迟疑道：“暂且避其锋。”柳如是愤然

举刀砍琴，琴弦皆断，遂不再与宋来往。

钱谦益降清后，并未得到清廷的重用和赏识，后以身患疾病乞假得旨回常熟。柳如是便又力促其暗中联络东林旧臣，以图复明，并卖尽金珠，资助义军，但志终未成。

柳如是风流倜傥的一生中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她以其人格气节，被誉为“女侠名姝”。





# 计东对人生的不息追求

李炳华

幕府山头夕照红，筹南慷慨亦英雄。

如何一第成蹉跌，终古溪阳恨无穷。

这是近代大诗人柳亚子先生为《盛湖竹枝词》作的一首题诗，咏的是清初著名诗人计东悲剧性的一生，作者对他的“怀才不遇”一掬同情之泪。

计东（1625～1676年），字甫草，号改亭，吴江盛泽人。十五岁时，补为诸生，以能文章早负盛名。明室衰微，他忧伤国事，著《筹南五论》。并以此去南京谒见大学士史可法，史公将他视为奇才，可惜当时南明大势已去，他的“筹南”计划无法实现。柳诗的头两句，写的即是此事。

明亡后，他隐居盛泽茅塔村，深自韬晦，闭门苦读。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社会走向稳定，计东于是年参加顺天乡试，获第七名，在御试中获第二名，一时名动京师。当吏部官员唱名唱到计东时，应试者上千人对他争

相拜揖，并欢然相顾说：“这就是江南的甫草先生啊！”这位理应仕途通畅的人才，不久却因受到“江南奏销案”的牵连，被除去功名，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宗伯王文贞与相国王熙父子对他十分器重，但屡次推荐而未果。直到康熙初年，开博学鸿儒科，王熙再次推举计东，派人到吴江寻访，计东已于一年前魂归黄泉了，时年52岁，王熙感慨唏嘘不已。

以仕宦而论，计东确是不幸的，他一再错过了历史给他的机遇。从家庭而言，计东同样是不幸的，他的长子计准，在15岁补为诸生后遽然病逝。计东为之恸哭不已，在村中建思子亭一座，以表哀思。他的死，与爱子之殇密切相关。计东是清初一位声望显赫的文学家，陈去病的《五石脂》指出：“国变后，……后起者又有计、顾、潘、吴四才子之目，即改亭、茂伦、稼堂、汉槎是也。”将计东列为吴江四才子之首。近人蔡丐因又将计东列入《清代七百名人传》，可见他的文名之盛。计东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度的评价，关键在于他对文学和人生的不息追求。于他的名望，其所到之处不少人虚馆设席争礼之下。他近则与汪琬讲欧曾之学，远则与汤斌讲程朱之学，使他“论有原本，其文醇正和雅”。他又长于交游，热心组织文学活动，据毛奇龄《骆叔夜墓志》说，计东曾同山阴骆复旦、会稽姜承烈、萧山毛奇龄、太仓吴伟业、吴县尤侗、华亭徐致远、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彝尊、杭州陆圻等当时名士结成十

郡大社，以数百条游艇荡漾于嘉兴南湖，一时传为文坛盛事。他又嗜古尚义，至顺德缅怀归震川，在归氏的废圃中长跪流涕；在邳城寻觅谢茂秦的葬处，在荒草丛中赋诗凭吊。他又接济流放出关的同邑友人吴兆宽，将自己的爱女配给兆宽的儿子。他的慷慨豪爽，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传世之作有《改亭诗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计东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但他的不懈追求也终成硕果。正如他的好友、大诗人汪琬对他一生的评价：“身受才名误，文从患难真。”



潘恽章（1626～1663年），字圣木，号力田。吴江平望溪港人。9岁时随父亲读书，过目不忘，15岁补县学生员。明亡后，他隐居故里，致力于学问，综贯百家，研究史事，终因“明史案”发，受牵连而被杀害，妻沈氏亦处流刑。

潘恽章有一好友，名吴炎，两人一起长大。清顺治四年（1647年）某日，因吴炎家中有丧事，潘恽章前往吊唁。相聚间，两人一起饮酒论诗，从《春秋》《诗经》谈起，一直谈到明代的文人志士，最后两人有了结社的想法，并将此想法告诉了隐居唐家湖的好友叶继武，当即得到赞同。

于是一个眷怀故明，耻事新朝的反清组织——“惊隐诗社”（亦称“逃社”）成立了。江浙遗民顾炎武、归庄、戴笠、王锡阐等都自愿入社，以其文其诗，表达反清思想。特别是吴江人戴笠，曾一度入秀峰山做和尚，还俗后隐

居同里，他认为明朝之亡亡于流寇，因而以日月为序作“寇事”，这给潘柽章以很大影响。经与吴炎、王锡阐商定，仿《史记》体例，编起了《明史记》。

当时，为了巩固满清统治，清廷开始在江南举行乡试，这就给了曾一度废止的社事活动复萌的机会。潘柽章等人利用“惊隐诗社”频繁相聚，《明史记》也有了较大进展。该记由潘柽章作“本纪”和“志”，吴炎撰“世家”“列传”，王锡阐写“年表”、“历法”，戴笠编“流寇志”。其中最难的是皇帝行程实录，为此，潘柽章变卖家产处心积虑到处寻访。编写过程中，潘、吴两人经常切磋，并得到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苏州陈济生的热情帮助，常熟钱谦益也慷慨以绛云楼部分遗书赠于两人。

可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正当潘柽章等的《明史记》将成稿时，清大兴“文字狱”，因湖州南浔庄廷铨以朱国桢《史概》为草本编写明史，而书中无清朝年号触犯了清朝统治者，南浔“明史案”发。书中有潘柽章、吴炎之名，二月，两人遭逮捕，他们的明史稿被焚，著述数年、稿成七八的一番心血被付之一炬。

潘、吴两人在杭州狱中依然骨气傲然，《平望续志》有潘柽章《虎林军营狱中》等诗，诗云：“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珮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闲谱龟螭慰苦辛。”同年六月，潘柽章、吴炎被斩于杭州弼教坊，同死者七十余人。

潘恠章不图功名，立志编史，遗著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顾炎武在祭潘、吴两人诗中曰：“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为潘、吴两人葬身“文字狱”深表痛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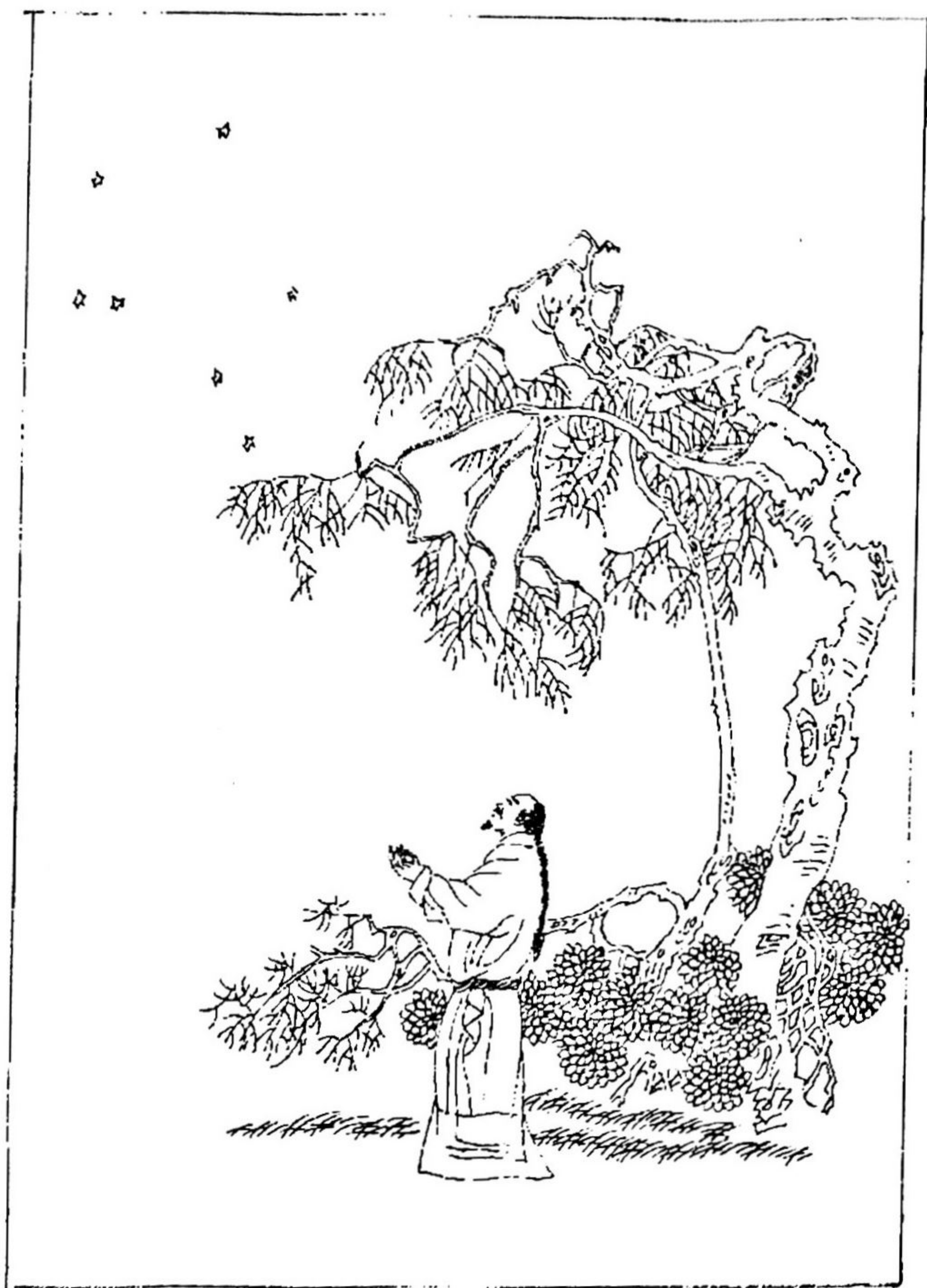


# 王锡阐矢志数学天文学

殷堰工

翻开中国数学史册，王锡阐的名字赫然在目，上面记载着：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是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由于古代数学和天文密不可分，因此，说王锡阐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天文家，也许更为贴切些。

据史料查证，王锡阐系吴江震泽人。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少年时便对数学、天文和音韵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年的科学兴趣奠定了他一生科学研究的基础。他毅然放弃了科举，长期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的研究。他的治学态度严肃认真，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惜时间，忍受了夏天的蚊虫叮咬，冬天的刺骨寒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观测星象。35岁时完成了名著《晓庵新法》。在数学上，他写出了中国人最早自著的平面三角学之一的《圜解》一卷及《筹算》一卷，创造了中国数学史上的又一个“之最”。



王锡阐矢志数学天文学

博采众长，独立思考是王锡阐成功的要诀。《晓庵新法》就是他应用当时刚传入中国的球面三角知识写成的，他在书中提出的水星凌日的计算方法成为世界首创。他自创的预测日月蚀的方法精确度甚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他“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借助数种“割圜”和“勾股”的测量方法，创造了兼中西之长，又自有发明的新历法。他关于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以及对行星运行轨道的原因解释均有独到的见解。

成才的路有很多条，自学无疑是一条坎坷但却能径通罗马之路，王锡阐矢志不渝，自学成才，献身科学，无疑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学习精神和科学成就为后世所瞩目敬仰。



名录《江苏古代科学家》的孙云球，是明末清初光学仪器制造的先行者，是我国民间独立制造望远镜的第一人。孙云球（1630～1662年），吴江人，字文玉、泗滨。其父孙成需曾任福建漳州知府，母亲董如兰通晓文墨。13岁时，孙云球中秀才，但他对科举仕途并无兴趣。迁居苏州虎丘不久，父亲病逝，家计全凭母亲卖药草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孙云球并不失志气馁，发愤苦读，学习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科学技术。

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和精心制作，孙云球终于发明了判定时刻十分准确的“自然晷”（一种天文时钟），为后人所惊叹。

其实，孙云球的光学仪器研究是从眼镜开始的。他常为视力弱者而痛苦，虽然宋代时已有人借用水晶的折射来制造提高视力的眼镜，明代开始有“单照”，但其原理与放大镜相仿，且只能携带，不能架在鼻梁上。为此，他决心

研制新型眼镜。通过反复实验，他终于以透明度很高的水晶作为材料，采用手工磨制的方法，制造出老花、少花、远光、近光等各种深浅度数不等的镜片，让人“随目对镜”，任意选择，且戴在鼻梁上既方便又轻松，大受众人欢迎。

眼镜的制造成功，为孙云球进一步研究光学树立了信心。不久，他又研制成功了万花镜、存目镜、幻容镜、远镜、火镜、摄光镜、夕阳镜、端容镜、梦香镜、察微镜、放光镜、夜明镜等七十多种镜片，其中“存目镜”即现在的放大镜，“幻容镜”就是现在的哈哈镜。据《吴门补乘》记载，有个名叫文康裔的严重近视者，获知孙云球能制各种眼镜，千里迢迢从浙江天台而来。孙云球为他仔细测定了视力，精心磨制了一副镜片，另外还赠送他一架千里镜。文康裔带上千里镜，登上苏州虎丘山，从新配的眼镜中观看苏州城内亭台楼阁历历犹在眼前；又从千里镜中观看远处天平、灵岩诸山，竟然近在脚下，他不禁啧啧赞叹，对孙云球的高超技艺深为敬佩。孙云球制造的千里镜（即望远镜）虽比荷兰伯利休的发明晚 50 年，但他不断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令人钦佩，为苏州成为中国有名的眼镜制造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孙云球将他制镜的经验写成《镜史》一书，请他母亲作序，为后代制镜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清顺治年间，发生了多起科场案，其中以南闱科场案最为惊世。吴江举子吴兆骞也因此案而蒙冤入狱，谪戍边塞二十余年。

吴兆骞（1631～1684年），字汉槎，吴江松陵人，出生于世袭宦官家庭。父亲吴晋锡任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刑狱之官。吴兆骞7岁时能解悟《太玄经》，9岁即能赋诗，写出了千言《胆赋》，10岁时仿作《京都赋》，才气过人。清顺治二年江南多社事，吴兆骞参加了慎交社。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三日，是我国传统的修禊节，慎交社与同声社在苏州虎丘举行首次集会。会上吴兆骞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与著名诗人吴梅村即席唱和，大家嗟叹弗及。吴梅村将他与宜兴陈维崧、华亭彭师度称为“江左三凤凰”，一时名噪天下。传闻至京师，“诸前辈钜公恨不识生也”。

顺治十四年八月，吴兆骞参加南京乡试成为举人。正当大喜之日却传来震惊朝野的科场



案消息，吴兆骞顿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浑身震颤。当时“权要贿赂，相习成风”，江南榜发后，群情大哗，清廷借机打击有反清思想的江南知识分子。顺治帝福临诏令江南总督将中举之人尽悉拿京，至刑部接受审查和参加复试。吴兆骞亦因此不得不告别父母、兄弟和妻女赴京，面对突发的事件，他深感前途渺茫，一路上不禁凄然泪下。在黄河之滨的客栈里，一时兴起，吟诗一首：“氈帐沈沈夜气寒，满庭霜月浸阑干。明朝又向渔阳去，白草黄沙马上看。”吟后，在墙壁上挥笔题诗百余首，落款为“金陵女子王倩娘”。

次年三月九日，吴兆骞到京，赴礼部点名后，即被拘刑入狱。他感到自己清白无辜，而真正作弊者却逍遥法外，深深痛心。入狱后第四天，顺治帝临瀛台，复试全部江南举子。那天试官罗列侦察，武士持夹棍、佩腰刀列于堂下，每一名举人均由两名持刀护军押送而进。在这种兵卫旁罗、试者形同罪人情况下，吴兆骞恨从心头起，激愤地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乎”，遂交了白卷。此事惊怒了皇帝，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亲定此案，犯案的正副主考方犹、钱开宗、十八房考官“俱著处绞，妻子家产籍没人官”；举人吴兆骞等八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人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吴兆骞便于次年闰三月初三被迫离京出塞。

其实，吴兆骞的入狱及遣戍与仇人告发有很大关

系。因为，他的傲气于孩提时就不为乡人喜欢，集社时与大批名士交往，名气大增，同时更使他傲岸不群，嫉妒之人日益增多，且他言语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慎交社，吴家兄弟“三珠照耀，一座尽倾”，得罪了許多人，而慎交社与同声社又常有矛盾，科场案发同声社的人就落井下石，挟嫌诬告，一纸谤书，使吴兆骞等人下狱谪戍，遗恨千秋。吴兆骞无辜被罪，慷慨悲歌：“苍黄荷索出深宫，扑目风沙掩泪看，自许文章堪报主，哪知罗网已摧肝。宽如精卫悲难尽，哀比啼鹃血未干。若道扣心天变色，应教六月见霜寒。”

吴兆骞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到了宁古塔戍所。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濒牡丹江，是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但吴兆骞出塞后并没有沉沦，他和南方迁客骚人组织“七谪之会”，是继函可和尚在沈阳组织的“冰天诗社”后东北的第二个诗社。塞外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痛苦的遭遇使他比较清醒地认识了现实，他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他的诗中有不少是反映在清朝封建专制压迫下知识分子的痛苦遭遇，也描写丰富多彩的边塞生活，反映边疆人民的淳朴勇武。还有一些诗反映了边疆军民抗御沙俄侵略，歌颂了各族人民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康熙三年（1664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师东征，出发之际，吴兆骞赋《奉送巴大将军东征罗察》热情送行。另外，他的三部词集还传到朝鲜，名享海外。

后来，吴兆骞终于因好友纳兰性德、徐乾学等人在



朝中斡旋，费赎金数千，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得以放归。由于长期的严寒生活，吴兆骞已不适江南水土气候，大病数月，赴京治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客死京城。





中国的古典文学，到清代，出现了又一次繁荣。这是集大成、总结式的繁荣。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和创作理论，到这一阶段，都趋于圆熟。诗词、戏曲、散文、小说等各个文学领域里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同时，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特别是诗话、词话这些专门针对诗、词进行品评、鉴赏的著作，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徐钊和他的《词苑丛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徐钊（1636～1708年），字电发，号虹亭，吴江西濠港（今属北厍）人，后迁松陵。他从小聪敏过人，12岁时，就以“残月无情入小楼”的诗句受到文学长辈们的激赏。由于他“赋性萧闲”，对于禁锢读书人思想的科举八股文不屑钻研，所以在科场上屡战屡败。为了排遣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他云游四方，走访和结交各地的旧友新朋，遍历吴、越、齐、

鲁的广袤大地。直到 1679 年（清康熙十八年），他 44 岁时，康熙帝玄烨开设博学鸿词科，召试四方文学之士于紫禁城的体仁阁下，当时擢取高等的仅 50 人，徐钜即其中之一。这 50 人全部进国史馆修纂《明史》，而徐钜所撰俞大猷、戚继光等大将的传记，尤为高洁缜密，被人们推许为大作手。但他并没有因此升官。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即 1686 年，终于罢官而去。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推测徐钜罢官的原因，一是“顺、康之际，诗人喜作宫词，皆有所指，非漫然拟古”。所谓“宫词”，是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徐钜也写了不少。邓之诚推测，徐钜是写宫词讽刺统治者，因而获罪。二是朝廷内部“党争之烈”。邓之诚举徐钜的《观史有感》为例：“熟读周南太史记，只疑封禅胜河渠”，以为“似由与同官争史稿修改，以致被放”。此外，还由于徐钜的另一首《小游仙诗》：“莫羨吹箫王子晋，夜深花底自弹箏”。诗意隐晦，后人读了莫明其妙，但徐钜却因此得罪了掌权者。由此看来，徐罢官的原因，首先是“赋性萧闲”的老毛病，使他厌恶官场的趋奉钻营，不能得到上司的青睐，同时，也不会拉帮结派，卖身投靠；其次，徐钜所处的时代，离明朝亡国不远，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在知识分子心中还比较浓烈，这可以从徐钜创作的一些诗歌中略窥端倪。这种心态，是他不能与新统治者很好合作的深层因素。值得玩味的是，他与前明遗老济宁人郑与侨的关系。郑生前有匡时济世的



抱负，悉心钻研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著有《碓庵稿》，明亡后，靠教书奉养老母以终。郑与侨不同清政府合作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但徐钜却与之十分投契，郑逝后，徐为之作传；有一次，徐钜乘船路过济宁，怀念亡友，因而赋诗一首，诗中充溢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苍凉沉痛的心情。

徐钜罢官以后，朝廷曾经又想起用他，官复原职，但他不愿再当官。他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二次游历，足迹到达江西的南昌和福建、浙江等地。在饱览名山大川的同时，与各地豪隽之士结交切磋，使他的创作风格为之一变，由早年的华美秀雅变为爽朗遒健。他创作的《菊庄词》，为朝鲜贡使仇元吉所赏识，用一饼黄金的代价购去，并寄赠诗一首：“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成为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

徐钜博学多能，工诗文，人称其“天才骏发，下笔数千言”。罢官以后，绝意仕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精博的学识，使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力都有更大的进步。回乡以后，在家中筑“丰草亭”，每天著述其中，著作有《南州草堂集》30卷行世。他对源于唐、盛于宋的词的创作，尤为擅长，对词的创作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据他自己所说，在旅途中，往往搜取前人作品，凡是觉得有趣味有心得的，就随手抄写在一张纸上，床边放一个竹笼，写好的纸条就放进行笼内，日子长了，



就汇集成一册，再根据作品的内容进行分类，形成《词苑丛谈》12卷。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历时6年，引用前人书籍达数百种，专门录取历代词人故实和词作评论，搜采繁富，叙述详明，与同时代人朱彝尊所编《词综》一书相辅行世，同为嘉惠后人的词学要籍。

综观徐钊一生，其主要成就在词学创作和品评上。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当然得力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另一方面，淡泊的襟怀，萧闲的个性，也是他不汲于功名利禄，能够静下心来精研学问的重要因素。

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以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誉满天下，而最能概括性体现他思想结晶的著作要数《日知录》。《日知录》全书32卷，是顾炎武的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士、艺文等分类编入，包含了顾炎武毕生的全部学术政治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出自《日知录》的“正始篇”。然而，能使这部书流传后世，使顾氏思想学说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弟子潘耒功不可没。

潘耒（1646～1708年），吴江平望镇人，潘怪章的弟弟，自幼秉性聪明，记忆力强。“阅时宪书，一过即能背诵”。他好学上进，与顾炎武、徐枋、王锡阐、吴炎及他的兄长潘怪章等为师友多年，对经籍、子史、诗赋、古文词、历算、音律等科均有研究，无不洞达。他拜顾炎武为师，对老师的思想学说十分敬重钦佩。而顾炎武对其亦很器重，外出游历常将其

带在身边，使其大开眼界，学识频增。

顾炎武在世时，曾将自己《日知录》手稿给潘耒看。潘耒看毕，即生感慨：“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日知录》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曾有初刻本8卷，后经顾炎武自己增补，康熙十五年（1676年）成30卷。顾炎武曾写信给潘耒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

顾炎武逝世后，《日知录》部分手稿在其家族手中。潘耒时时想到先生的遗愿。为宣传先生的学识思想，使《日知录》全稿闻世，他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初刻本30卷和其他全部手稿，反复研读，再三校勘，并缮写成本。同时，他积极鼓动顾炎武的外甥尚书徐健庵和大学士徐立斋，一起付诸刻印，但终因种种原由，未能实现。后徐健庵、徐立斋相继去世。潘耒无奈，只得将缮本32卷携至福建，最后在他朋友汪悔斋的帮助下，以卖山所得的资金，付费刻印，终于成书。此书虽成于顾炎武谢世13年后，但其精辟的思想理论和通达的文化史观，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之后，研究、评说不绝于世。

潘耒本性聪明，才华出众，曾以布衣中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曾献平蜀、平滇二赋，得康熙赞



赏。康熙南巡，他又作为随员，不离左右。后因名盛众忌，劾为浮躁，解职南归。南归后，他在接受顾炎武思想之时，学业又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赐复原官，但他坚辞不受，一心潜于学术。他提出了“俗儒”要向“通俗”转变的观点，并批判了科举取士误导人才的时弊。他认为科举制度使学风浮泛，无用之学流行于世，提出“得浮华之士百，不如得实学之士一。”他的人才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才发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徐大椿（1693～1772年），字灵胎，号洄溪老人，吴江松陵人，清代名医。徐灵胎年轻时不行医，经常出门游历考察，熟谙社会风土人情，热心于家乡的水利事业。他成为一名医生是因家庭的缘故，尽管早先他也爱看各种医书，但那仅仅是看看而已，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一点医学方面的知识。后来，疾病接连不断地降临他的家庭。首先是他的三弟痞病缠身，不久四弟五弟又相继病逝，接着，父亲亦因悲伤过度而得病。失去亲人的悲痛，父亲病危的焦急，忽然使他感到了医学的重要。在这人世间，他感叹惟有医道才是救拯生命、制服病魔的法器。他发誓一定要掌握它。

他开始发愤学医，把家藏的数十种书找出来日夜攻读，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个中的奥秘。后来，他又广求博采，阅读医书达万余卷。虽然这时徐灵胎已人到中年，但他学习的劲头丝毫不减，钻研医书的决心毫不动摇。他

回避社交，潜心攻读，对祖国医学的研究日益精深。徐灵胎不仅看重书本理论的学习，还十分重视实践知识的积累，不断总结各种病例及医治的经验和教训。渐渐地，四乡八邻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家庭的阴影使他在看病时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草率。他知道自己的每一张药方，都涉及到一条鲜活的生命。他看病行医一视同仁，从不分穷富贱贵，相反，对穷苦人家前来求医，格外同情与认真，尽量让他们花少量的钱而治好病，有些没钱治病的人，只要让他遇见了，他总是慷慨解囊，送药上门，直至病人痊愈为止。

徐灵胎行医看病时已年近半百，医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精通内科、儿科、妇科，对外科伤科也颇有造诣；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疑难杂症，能果断采取措施，大胆用药，许多久治无效的病人，到他手中便药到病除，奇迹般地治愈了。远远近近有不少人都把他当作神医。

有一次，抬来了一位病妇，面色苍白，额上淌着黄豆般的汗珠。病妇双膝针刺般剧痛，不能站立。徐灵胎琢磨片刻后，就让人把病妇用厚褥单裹起来，让其全身发热，大汗淋漓，过后，立刻用双手不停地推拿安抚双膝，一次，两次……几次下来，没有任何草药，就把病妇治好了。又一次，有户人家添了一个男孩，可是，小孩浑身好像没有皮肤，形象可怕也招人可怜。有人见了便说这是妖怪，要快快丢弃。徐灵胎闻讯后立刻赶到那



里，检查过婴儿后，叫病儿父母不要轻信流言，世上并无妖怪，这是一个没发育好的病儿。他让人将糯米粉打成薄片拌药后紧紧粘合在婴儿身上，外面再用绢布包扎好。两昼夜后，婴儿就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全家人又高兴又感激，都说是灵胎救了这条小生命。

清代文学家袁枚左臂患疾，多方求医而不愈。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徐灵胎。灵胎一边用药一边推拿针灸，使袁枚的胳膊恢复如常。后来他俩成了好朋友，常常在一起吟诗喝酒，往来甚密。徐灵胎自幼酷爱文学，与袁枚相遇，如遇知己。徐灵胎仰慕袁枚的文才，袁枚钦佩灵胎的医术。徐灵胎死后，袁枚专门为他作传，记述了他的医德、医风和高超的医术。

乾隆三十六年，已经 79 高龄的徐灵胎自审脉象，知道留在世上日子不多了，便把家人叫到身边，嘱咐后事。不久，他病卧于床。不料，忽然诏书下来，皇帝令他进京看病。在此之前，徐灵胎多次被召进京，为朝中官员看病，皇帝曾要他留在宫内当御医，他借口有病未允。他不贪高官厚禄，喜欢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纯朴的乡亲。此刻，又要进京。他实在有病难从呀！可是皇命难违，且地方官员步步紧逼，他只好勉强支撑起床，由儿子徐熾携扶上路。他除了带一个药箱，又备上一具空棺材，以备殉难。一路车船不停赶到北京，已是年底。他顾不上休息便看病，然而，虚弱的他搭脉握笔已难以自主。未过几日，心力交瘁的徐灵胎便在异乡客店与世长

辞了。

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却是永存的。他的《医学源流论》、《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都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对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叶天士的《临证指南》等作了详细的评注，许多见解十分精辟。徐灵胎集自己几十年临床经验完成的这些书卷，是祖国医学事业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医学理论及治疗方案，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 吴树臣秉公执法诛王五

俞 前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北京城内有个巨猾王五，为偷为盗，奸淫杀人，无恶不作。由于他拥有万金，与官府勾结，告他状的人虽多却未能惩治他。当时，新任刑部员外郎吴树臣闻知，决心为民除害。

吴树臣，字大冯，生卒不详，吴江松陵人。祖父吴晋锡，父亲吴兆宽，叔父吴兆騫等均负盛名。康熙中期，吴树臣从拔贡入国子监，教习正白旗。后在广东四合县、四川汉州等地任官。他为官清正，执法公断，颇得民心。在汉州任职时，因当地处川陕要冲，原有一条通衢虽稍远但较平坦，而当地官府想修一条很险峻、又多栈道的新路。吴树臣上任后，上司屡次催促开修新路，欲借修筑通衢以谋功利。吴树臣多次沿路考察，发现官修新路弊多利少，百姓又常愿意旧道行走，便如实向上司汇报，请求放弃开修新路，而恢复旧道。上司不辩是非，十分恼怒，忌恨他误了自己的获取



政绩的机会，借故弹劾吴树臣，吴树臣被降职罢归。因后来朝廷知道他是受了诬告，便下旨任受潼州知州。吴树臣在潼州为官 13 年，政绩颇丰，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升迁刑部员外郎。

到任后，吴树臣就遇上了王五的案子。当他查明王五实据后，即将其逮捕到案。因王五案子涉及甚众，一些高官曾受其贿赂，纷纷前来说情，更甚者，连刑部尚书王士禎及其他官吏也插手此案，阻止吴树臣审处。

吴树臣不惧上，不压下，秉公执法，义无反顾地上书康熙帝，列述王五罪恶。当康熙皇帝见到奏章，拍案大怒，立即下诏诛杀王五，并将尚书王士禎削职，其余包庇王五的，为王五说情的，或鞭笞，或流徙。而对吴树臣大加褒奖。

吴树臣不为邪恶逼迫而屈服，忠于职守，为民除害，深得京城百姓的称赞。

吴江芦墟的一条弄名叫“竖头斋匾”，据说原是清朝乾隆年间湖南巡抚陆耀的府宅，因府宅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竖题“龙章宠锡”匾额，故名。当时，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修身治国无双士”，下联为“教子传家第一人”。

陆耀（1723～1785年），字青来，号朗夫，吴江芦墟人。父亲陆瓚擅长书法，在北方做过小官。陆耀从小有志于学，以古代君子自我激励。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举，甲戌（1754年）科进士，授内阁中书，入军机处，曾出任过山东登州府知府，济南运河道按察使、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

陆耀为官清廉，并经常告诫部下守律，曾手书廉政官箴三则。当时和珅当权，行贿之风盛行，陆耀书道：“燕雀处堂，自谓无患。黄金、白璧来则受纳，独不念天处高而听则卑哉。”他教诲部下“院司贪，不能令知府不贪；

知府贪，不能令州县不贪。诚使上下一心，各矢廉洁，则不言兴利，而利已甚博；不言除害，害已潜消”。陆耀更以此自律，朝野皆闻。

当时，陆耀任湖南巡抚，各地督抚都要搜罗民间奇珍异宝进献京城，以取得上司的喜欢，但陆耀不与此种官员为伍，即使对乾隆皇帝亦不过进献几种当地土产而已。对和珅，陆耀更是不拍不媚，从不孝敬一金一银。据史书记载，有年湖南大旱，总督亲抵衙门，陆耀招待尽是蔬肴，并说，“此间不雨久矣，祷雨戒屠杀，从是不茹荤”。总督深深为陆耀虔诚求雨解民于倒悬之心感叹：“吾日前入境，所至馆舍，酒肉淋漓，奴隶醉饱。而家人莫以告，是吾过也。”随即，连素食也不吃，令人撤去餐具，以表悔改之心。

陆耀身体力行，洁身自律，持节不变。乾隆五十年（1785年），湖南复旱，陆耀与当地官民一起抗旱救灾。六月，因带病在酷暑中求神降雨，劳累过度而歿，遗物只有几箱破衣。乾隆皇帝知其忠廉，朱批“可惜”赐祭。

陆耀在长沙任上曾有诗两句：“能开衡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可算得他的箴言。而“利，莫大于阜民之财；害，莫深于夺民之食”的格言，于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光绪年间，曾任湖南巡抚等职的吴大澂家居苏州时，就精于鉴别字画，以收藏名画而知名海内。一天，吴大澂看到一幅画，不由拍案叫绝：“三百年无此作矣！”该画为吴江画家陆恢所作。

陆恢（1851～1920年），初名友奎，又名友恢，字廉夫，别署话雨楼主、寡癖居士等。吴江同里人，后卜居苏州河沿街。早年跟从当地书画名家严承健、任瓚、陶焘、刘德六等人研习书画。严承健工行楷，凝厚恣肆，颇得魏人笔意；任瓚曾为两广总督幕僚，工楷书。里中碑刻多出其手；陶焘，周庄人，善山水画，习董其昌，苍莽浑厚，笔意峭拔，又能画松鹤，极古健；刘德六，跟从夏子学画花卉，出笔秀逸，翎毛、草虫、蔬果并臻妙境，尤长画腰蜂，人称“刘胡蜂”，与平望人翁雒“翁乌龟”并称。陆恢虚心好学，刻苦专习，特别是跟从刘德六游学，画艺大进。他好学不倦，一

次经过僧寺，看到十八座罗汉，竟以纸墨画摹而归。

陆恢的绘画，山水、花鸟、果品无一不能，书法行、楷、草、篆样样皆精，尤工汉隶。他的成功之道，当在虚心好学，遍取众长，并且敢于超越。时人称刘德六也“偶作山水微嫌刻露，不得不让恢出一头地”，“名转为恢所掩”。

陆恢在书画上的造诣深得吴大澂赞赏。吴大澂命人寻访陆恢，两人相见，研文谈艺非常投机。吴大澂拿出家中所藏历代名迹，让陆恢观赏，上窥唐、宋，下抚元、明，使陆恢大开眼界，艺事竞进。从此，陆恢便成了吴大澂幕客。他跟随吴大澂游三湘、辽东名胜。在洞庭湖泛舟，在衡山揽胜，观浩淼江海，察四季变化，“胸罗林壑，手书云”，所历既广，笔意苍劲逸丽，古拙幽深。曾作《衡山记游图》八幅，堪称生平杰作。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集海内名画家补绘王元晖所进承华事略，得知陆恢画艺精湛，请他担任总领。于是，他带领一批画家潜心描绘，从中也带出了一批弟子。如早年就从师于他的金家坝人沈塘，后由吴大澂荐为张之洞幕宾，曾游学日本，被日人争留为师，晚年移居苏州旧学前大新巷，重理笔墨，四方人求画者不绝于门，而且重收藏，精鉴赏。

陆恢中年归苏州桃花坞，与吴大澂、王同愈、吴昌硕等结社于顾氏怡园，潜心绘事，考订金石文字，成为清末民初江南老画师，所授弟子几十人，如沈塘、樊浩

霖、顾愚、陈摩等，吴江盛泽人郑怀桥，也因得到陆恢指授，画艺大进，成为后来盛泽红梨书画会的活跃人物。

陆恢在书画艺术上能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超越前人，启发后人，终成一代名流。





清道光年间，在中国流传着一本日本国史，名为《吾妻镜》，共50卷，引起了不少中国史学者的关注。翁广平特别喜爱异志奇书，当他从杭州振绮堂汪氏处见到此书，竟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然而汪氏量窄，不肯外借。翁广平虽书未到手，但矢志不减，终于从另一朋友处觅得此书，秉烛数月，抄得24册，可惜约定还期到了，又只得完璧奉还。书未抄全，壮志未酬，翁广平又千方百计寻觅此书，最后在乡人的帮助下，又得到一抄本，两个抄本合在一块，总算全本。翁广平开始细读此《吾妻镜》，一读竟是半年。

《吾妻镜》记载的是日本治平四年至文永二年间的80年历史。翁广平发现，这本史书对将军执政次第、国王世系及会射之节记得很详细，但对其他该记之事却疏漏未记。并且书中还有许多伪谬处、芜秽处、疏略处，如：神武天皇时期记作中国东周僖王甲寅年，实则是

周惠王十七年，看着看着，翁广平忽然生出了补修《吾妻镜》的念头。

翁广平（1760～1842年），字海琛，吴江平望人。7岁已解文字。久未考取秀才，直至47岁才补得苏州府学生。然而，他勤学好思，广研博览，曾从唐仲冕、姚鼐、洪良洁、张士元等当时名流游学。姚鼐在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序中记道：庚午秋，翁广平至南京钟山书院拜见姚鼐。翁广平敞胸露肚，脚着草鞋，露出布袜，丝毫不修边幅。初时，姚鼐并不在意，当翁广平恭恭敬敬捧出数十万言的文稿，请姚鼐教正，姚鼐顿时刮目相看。一交谈，竟又发觉翁广平无论对经史、象纬、舆地、六书，还是对韵学、诗词，无一不通，更是肃然起敬，两人遂结为好友，后来多次交往。

翁广平勤奋好学，而且独具慧眼，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早年住普陀山，观察日出月落，星象变化，写出了《日食即日月合璧论》、《月盈亏论》、《陨星论》等科学著作，对后人研究天文起着不小的作用。

这次，翁广平又欲补修《吾妻镜》，乡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这是外国史书，且又缺乏佐证资料，既难为，又无价值。但是翁广平认为国有疆而学无界，敢于指出别人的错处和不足，是对别人的爱护和负责，如实叙事是每个史学者的责任。翁广平就是在这种认识下，广泛地收集有关日本国史的资料。他托人从出海船只带回有关书籍数十种，潜心研究，反复考证，不以穷困坠

志，世人称其为“安贫力学之士”。终于，集世系表 10 卷，地理、风土、食货、职官、艺文、兵事 20 卷的《吾妻镜补》著成了。当日本国的史学家得知本国的国史著作远在异国他乡被考证补记，不禁惊诧。于是，翁广平的名声也传至海外。





吴江妇女运动领导者张应春和中国早期的著名电影演员殷明珠是吴江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俩都曾就读于“吴江县第四区女子学校”，都是在那里受到了启蒙教育而立志成才的。而这所女子学校的创办者，也是一位女子，名曰倪寿芝。

倪寿芝（1864—1943年），出生于吴江黎里东栅的书香世家。18岁嫁与王燮卿，按习俗又称王倪寿芝，1902年，33岁时丧夫后返娘家居住。当时，其弟倪与三在日本学医毕业回国，他劝她去上海成东女校选科学习。翌年倪寿芝肄业返黎里，与胞弟倪迪民、倪与三及乡绅王资葛、徐帆鸥等人筹划创办学校。倪寿芝毅然变卖首饰创办了当时镇上第一所平民学校“求吾蒙塾”，她自任学监，亲自从儿童教育抓起。塾中功课一律采用新学，设立国文、算术、自然等课程，更加可贵的是开了兼收女生之先例。这在农村小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黎里风气闭塞，且科举未废。新学肇萌，“求吾蒙塾”学生入校不论孔孟之道，又不读“千字文”“百家姓”，且男女同校，遭致封建遗少和顽固势力的指责，更有用告白（即大字报）张贴街头，造谣攻击倪寿芝。倪寿芝不畏人言，力排非议，并于下一年将“求吾蒙塾”更名为“私立小学校”。学校仍男女生兼收，赢得社会进步人士的赞扬和支持，求学者越来越多。1907年春，设立分部，女生部就设立在倪寿芝的住所，当时她住在楼上，楼下二间作教室、一间作教师办公室。同时，她又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嚶鸣手工会”等，鼓励女子放足并学习刺绣、缝纫、记帐等技能，使之能自食其力。学生的作品曾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并获奖章，奖状各二。1908年，因资金和教员匮乏，就此停办男学。1914年，倪寿芝的女校与同镇另一“明懿女校”合并，成立“吴江县第四区女子学校”，由民办改为公立，校址也从原来的倪家住宅迁入镇公所旧址，倪寿芝任校长。任职期间，倪寿芝任劳任怨，致力办学育才，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女子，张应春、殷明珠就是杰出代表。

1922年，62岁的倪寿芝因积劳成疾，辞去校长职务。之后，她对学校建设仍关心备至，又捐七十多亩田产以充学校经费，还拆去家中花园、假山，以作学校操场，并在校舍前移垒起假山，美化校园环境。

倪寿芝生活在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时期。以一个妇女

敢于冲破封建传统思想束缚，自筹资金自办学校，开一代女子教育之风，这对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民主革命是个推进，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1996年4月，曾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先生捐资，在吴江黎里镇中心小学校院内建立了“王倪寿芝纪念亭”，以此永远纪念这位吴江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汪永亨绸庄是盛泽九大绸庄之一，在盛泽丝绸业中名重一时。清末民初，汪永亨绸庄选送的绸样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北京国货展览会、南京南洋劝业会、杭州西湖博览会等赛会上频频获奖，为“盛纺”走出国门，饮誉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汪永亨绸庄的煌煌业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其庄主汪鞠如老先生。

汪鞠如（1871～1949年），吴江盛泽人，在继承父业时年仅二十多岁。幼时资质并不聪颖，在读了几年私塾之后，父亲便令他在自己庄中当学徒，学习“看庄”的本领。在学徒生涯中，他认识到盛泽各种绸类，都是由镇乡各机户手工织造，再经各领投（丝绸中间人）分别收购，所用丝经粗细不匀，织造手艺也高下悬殊，因此，看庄时验货喝价，实在是把握质量的关键所在。他经过多年实践，掌握了其中的诀窍，成为一名看庄好手，为日后主持庄务

打下了基础。奉父命接管绸类业务后，他更加刻苦自励，力求精通业务。他出售的货品，俱为上乘，在客商中赢得信誉。他选送的样品屡屡获得国际金奖，其源亦盖出于此。

过去盛泽绸类在练白、染色、整理等加工过程中，均须上浆，这样绸身显得挺括厚实。但浆份容易吸水，以致在运输中往往发生霉变。汪鞠如有鉴于此，就决心打破旧规，倡议改浆货为清水货，并率先实行，从而赢得客商的好评。从此，盛绸实现了一次工艺上的革命。

汪永亨在上海设有分行。上海乃客商麇集之地，绸商间为收售价格经常发生矛盾。汪鞠如经过调查研究，倡议约齐绸业同行，每年从春季新丝上市到秋季，分三次议订开盘价不再变动。这一倡议获得同业的支持，减少了商业纠纷。

在盛泽绸业界，丝织与练染历来“划地而治”，各不相干。但落后的练染整理技术束缚了绸业的发展。1923年，汪鞠如为推进练染工艺革新，组织华新整理公司，投资三千银元由上海购进先进设备。这一举措因遭到当地绍兴籍人的群起反对而未能实行。但新闻界支持汪鞠如的革新举动，奉劝绍兴籍人士不应“墨守旧法”，否则难免有“淘汰之一日”。汪鞠如气度豁达，他为了发展盛泽绸业，广泛搜集各地样品，陈列于绸业公所内，供绸业同仁一起观摩切磋。他所经销的品种也越来越多，除原有的纺、罗、绫外，还有花纺、线条纺、

彩条纺、缎条纺等新颖品种。

由于汪鞠如坚持实践，不断革新，汪永亨绸庄每年获利逾万金，当时极其鼎盛，号称资金六十万两。汪氏成为盛泽丝绸史上一位出色的实业家。





蔡寅（1873～1934年），字治民，又字清任，别号怀庐、壮怀，法号宗寅，吴江黎里人，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16岁赴同里等地求学，苦读勤练，以至“寒夜不寐”，不久考取秀才。“石性坚而贞、石灵神且异”，“攻错得石友，磨砺资国器”——蔡寅在求学期间写下的这些诗句，表达了他的宏大志向。

甲午战争爆发后，外患丛生，中华有志之士，奔走呼号。1898年，蔡寅与金松岑、陈去病等在同里组织雪耻学会，呼吁救国图存。1903年，蔡寅和内侄柳亚子等赴沪，入中国教育会附设的爱国学社学习。此后，便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结为密友。此间，他与柳亚子等三人资助刊印邹容所著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这两部著作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革命军》，出版后风行海内外。蔡寅

还与章太炎、邹容、柳亚子四人合撰《驳〈革命驳议〉》一文，在以言论锋利著称的《苏报》上发表。同年6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陷狱，蔡寅多方营救，与金松岑等一起出钱聘英国律师琼斯为章、邹辩护，又密写书札托金松岑带入狱中，致意章、邹。但营救未获成功。带着失望和痛苦的心情，蔡寅离开上海，不久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留学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民主志士陈其美，由陈引见又结识了敬慕已久的孙中山和黄兴，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学成归国后，蔡寅被派往宁波任地方检察厅检察官。1911年（旧历辛亥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陈其美在上海设沪军都督府。被委为都督府军法司长的蔡寅，积极辅助陈其美，政绩显著。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蔡寅入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上海都督府也随之撤销。蔡寅受江苏都督程德全聘请担任秘书。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此案实属袁世凯幕后操纵所为。“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人心激昂。蔡寅竭尽全力，力促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发传票，要袁世凯到上海候审，同时悬赏缉拿凶手。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裁撤江苏各级审检厅，另派张一鹏任江苏司法筹备处长，后因舆论反对，张一鹏离职。程德全即委蔡寅担任江苏司法筹备处长。蔡寅赴京面见司法总



长要求保留各级审检厅，未获同意，愤然辞职离去。

“二次革命”爆发，黄兴领兵进驻南京，亲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程临阵退却，托病躲入上海租界。江苏一时无主，各方推举蔡寅出任代都督，主持苏政。他上任后首先电告全省父老兄弟，讨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勉励各地搞好治安，惩治坏人，保持社会各界安定。同时，向社会各界筹集军饷，在军队中选任贤能，整顿纲纪，动员和激励全体将士奋起讨袁。在讨袁义军屡遭失利，袁军冯国璋、张勋两部直扑南京的危急关头，蔡寅亲率将士死守天保城，血战二十多天，天保城五失五得。义军终因力量单薄而失利，蔡寅挥泪随黄兴撤走上海。

蔡寅是一名民主革命的斗士，同时又是一位出众的学者。他才华横溢。柳亚子主盟南社时，将其推为巨擘。蔡寅对诗学很有研究，善于作诗，其子孝宽曾收集其遗稿辑成《怀庐诗钞》1册（手抄本），金松岑为之作序，称“今展治民诗，乃洒落有风度，盖无意于崇唐揖宋，而自选乎诗人之庭。与山民父子相抚手者也。”蔡寅还擅长书法，他的画也颇具青藤风格。

“经国有才皆百练，著书无字不千秋。”这是蔡寅先生书写的对联，他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历尽艰辛，走出了一条壮丽的人生之路。



吴江，素称东南文献之邦。明末几社、复社一班东南俊彦，在腥风血雨中留下大量可歌可泣的名篇华章。但是，历朝兵祸、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破坏，不知毁坏了多少重要典籍。对此，历代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他们穷年累月，呕心沥血，发奋征集、编撰乡邦文献，使之传诸后世。陈去病，就是其中功绩卓著的一位。

陈去病（1874～1933年），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巢南。吴江同里人。清末，出于反清斗争的需要，他起始收集乡邦文献。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去病访得明末吴江抗清英雄吴日生遗稿，即行校补，整理成集，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1907年即将刊印之际，他喜极驰书柳亚子，并索诗以记。柳亚子即应以五律四首，大为推崇，有云：“遗闻珍义侠，喜气溢门楣。杨 千秋事，如君信可师。”后，陈去病又收集编定了《吴赤溟先生遗集》、《夏文忠

内史父子合集》、《杨忠文先生实录补遗》和《明季三大儒正气集》。

明末吴江反清志士潘力田，曾收集吴江文史掌故，编成《松陵文献》。陈去病仿潘氏之例，发奋十年，于1911年编成《松陵文集》，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吴江文人的大量散文作品。《文献》记史，《文集》征文，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松陵文集》共分三编，编成后逐编印行。柳亚子欣然为之撰序，有云：“今陈子此书出，发潜德之幽光，明文章之信美，用以表彰前哲，昭示来许，杞宋有证，于是乎在。而承学之士，有所观感，亦将专精壹志，发愤兴起，无使粉榆鸿业，自我而堕地。”

1913年，陈去病编定《笠泽词征》。此书共30卷，辑录宋代以来吴江词人二百余家作品，外附陆行直《词旨》、沈义父《乐府指迷》及郭频伽《词品》三书。《笠泽词征》自1915年起逐卷印行，历时多年。一卷印出，即脱手流传，不胫远走，待全书出齐，前数卷已不多见，读书人都为难以得到卷帙齐全的完备之本而抱憾。为此柳亚子欣然出资于1921年为重印二百部，并补印缺佚者。

陈去病还撰有《五石脂》，此书取材广泛，考证严谨，突出地歌颂了明末清初吴江乃至苏州、松江地区的抗清斗争，如吴日生、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顾炎武、杨廷枢等的悲壮激越、可歌可泣的事迹。同时揭露了清王朝的血腥镇压。对反清义士的铮铮气节着意予以

褒扬；而对趋炎附势的民族败类，尽情给予鞭挞。《五石脂》于1909年在上海《国粹学报》分段连载。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作为“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正式出版。

此外，陈去病还编有《吴江诗录》、《陆沉丛书》、《明遗民录》等。这些乡邦文献，表彰前哲，昭示来者，在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今天，仍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列为清末四部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谁都知道出自常熟人曾朴的手笔，其实却是吴江金松岑首先发起创作的。曾朴修订该书时，曾有一段说明，略云：“这书造意的动机，并不是我，是爱自由者。爱自由者，在本书的楔子里就出现。但一般读者，往往认为虚构的，其实不是虚构，是实事。”“他非别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

金松岑（1874～1947年），原名懋基，又名天翮，天羽，号壮游、鹤望，笔名金一，天放楼主人等。吴江同里人。时人誉为国学大师，与柳亚子、陈去病并称为清末民初吴江三杰。清光绪二十五年，他在同里创办“自治学社”和“理化音乐传习所”，传授新文化，翌年“苏报案”发，他从沪回乡筹措经费，延请律师为章太炎、邹容辩护，资助《革命军》出版，他还翻译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三

本书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03年，正值日俄战争前夜。俄国军队占领我国奉天，东北三省很可能成为日俄战争的战场。金松岑原意要写一部揭露帝俄侵略野心的政治小说，以出使俄国的洪文卿（书中名金雯青）作为主角，以赛金花（书中名傅彩云）为配角，“而内容包含中俄外交、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金松岑对小说这种体裁不甚熟悉，《孽海花》仅写了六回便中止了。其中第一、二回以笔名爱自由者发表于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八期。在这已写就的六回中，金松岑深刻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抨击了科举制度的罪恶，热烈地赞扬了孙中山、史坚如等人的革命精神，发表了许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议论。此时常熟曾朴来到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出版《小说林》杂志。金松岑将《孽海花》前六回稿请曾朴看了，曾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金松岑便顺水推舟，请曾朴续写下去。为此，两人共同商量了预定的六十回目。结果，曾朴以三个月之力，一气呵成了二十回。里面的前六回，金氏原文保存甚多。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照搬原稿，一字未改；其余部分，也是触处都有。1905年春，二十回本《孽海花》由小说林书社正式出版，平装两册，封面标明历史小说。出版后不到一、二年，竟再

版十五次，销行五万部之多，1928年，曾氏将此书修补成三十回，后又续写五回。1962年，魏绍昌所编《孽海花资料》，将金松岑所写前六回初稿列入资料中，并刊出了金氏40岁时的一帧西装照片。

金松岑少年时，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句自勉，特别是1904年出版的《自由血》一书，以“不自由，毋宁死”来表达自己争自由的决心，深刻反映了他当时与封建专制政治彻底决裂的心情，从爱自由者的笔名，到造意《孽海花》，编写《新中国唱歌集》，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勇敢地挑起时代责任的决心。



# 施肇基外交显才干

李廉深

施肇基（1877～1958年），吴江震泽人。中国近代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6岁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他自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内，曾历任外务部右丞、左丞，辛亥革命后又历任驻英、美公使、大使，常驻国际联盟代表，外交总长等要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和会，参加者有中、英、法、美、意等27国。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施肇基任二席代表。

和会之前，施肇基和顾维钧二人共拟了7个问题：“其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其二，归还租借地；其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其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其五，撤去外国驻军；其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其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但会议在美英法三

国操纵下，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对此，施肇基、顾维钧等坚持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一致赞成拒签。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由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不利决定，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在国内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代表，每日往中国代表团总部，提出警告、示威，制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国内部分省的督军省长亦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终于迫使代表团不顾北京当局愿意签字的意向，不去凡尔赛签约，并对巴黎的新闻界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庄严声明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果断采取拒签行动，以符民意。施肇基在6月28日前毅然离开巴黎返回伦敦。6月28日下午在凡尔赛宫签字会上，中国代表团缺席，这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

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参加国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9国。中国代表团由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及王宠惠三人组成。施肇基为首席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于1921

年11月16日向第一次太平洋暨远东委员会提出十条原则和宣言。并于1922年1月的会议期间，向国内政府当局发出“关于收回威海卫及拒绝外人在中国设立无线电台与鲁案等问题”请示机宜的电文。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原则十条，为之作了努力。但在美英法列强操纵下，终于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在华盛顿会议以后，施肇基一度回国，任张绍曾内阁外长。

施肇基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近半个世纪活动在国际外交舞台，在维护国家尊严，争取主权地位中尽了努力，他的外交才干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 郑辟疆的油灯人生

周德华

深夜，梭织之声不绝，荧荧灯光，母织子读，一幅中落的丝绸世家织读图。少年郑辟疆在油灯下完成启蒙教育。未及弱冠，中了秀才。

郑辟疆（1880～1969年），字紫卿，吴江盛泽人。18岁考入我国第一所蚕桑高等学校——杭州西湖蚕学馆，时馆中不乏富家子弟，沉湎于杭城犬马声色之中。而郑辟疆一介寒士，洁身自好，发愤苦读。与他相伴的是母亲送给他的一盏油灯。他为了节省伙食费，常以炒米充饥。油灯在侧，睹物思情，力量倍增，更加勤奋。

4年后，郑辟疆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又被公派日本长崎留学。回国后终身从事蚕桑教育及科研，先后执教于山东青州及苏州。他担任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前身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达51年之久，为我国教育史上所罕见。1923年，他带

领师生走向社会，推广科学养蚕，首先在震泽、严墓进行，后扩及吴县、无锡、常州、江阴等地，被我国近代蚕业史称为“土种革命”和“土丝改良运动”。1929年他支持庙港开弦弓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并协助该社创办小型机械缫丝厂，这是我国第一家农民合作丝厂，是现代乡镇缫丝业的鼻祖。

郑辟疆在本世纪初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八册蚕桑规范化教材，为我国蚕桑教育奠定了基础。通过他的教育，农村蚕业的面貌大有改观，他因此深受乡民爱戴，浒墅关一带农民亲切地称他为“校长先生”。

郑辟疆以油灯为伴，也以油灯自诩。他嘉勉他的学生，常说油灯能量虽小，但能尽其所能发光发热；又说一盏油灯只能照亮一方，千万盏油灯才能照亮天下。他的育人精神和为人品格，正如一盏油灯，光亮和温暖了一代又一代蚕桑人才。

1969年11月，郑辟疆先生与世长辞，留下遗诗一首，其中前四句为：“生存无止境，好比油灯尽，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须惜。”

在中国现代数学史上，有许多辛勤执教的老前辈，他们作出过许多研究成果。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为了数学事业，他们惨淡经营，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郑之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郑之蕃（1887～1963年），字桐荪，吴江盛泽人，早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光绪末年，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郑之蕃，只身一人登上了横渡大洋的海轮，告别祖国，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州绮色佳城，在那里的康奈尔大学专攻数学。他不负国家的重托，学习异常刻苦，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学成回国，从事数学教育。据有关资料（《中国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考证，郑之蕃是清末出国学习数学第一人。

数学的发展固然有很多因素互相制约，而人才是至关重要的。郑之蕃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他决心把自己在海外学到的先进的科学知



识，传播到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使之生根、开花、结果。他回国后，便执教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而后赴上海南洋公学任教，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呕心沥血。1920年受聘于国内最高学府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1925年应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华罗庚教授的老师）之邀与杨武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等人一起筹办算学系，卓有成效，培养了像陈省身（美国数学会前主席）、吴大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这样出类拔萃的数学英才，为中国现代数学的腾飞作出了贡献。

1935年，中国的数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中国数学会就应运而生了。在成立大会上，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郑之蕃被选为董事会的九名董事之一，其名字列陈建功、苏步青之前，成为我国数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郑之蕃一生致力于数学名词的编译工作，前后几版的《数学名词》倾注了他的许多心血，反响热烈。郑之蕃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也很有研究，造诣颇深，著有《四元开方释要》、《墨经中的数理思想》等书。1952年退休后，郑写下了许多诗篇，热烈歌颂社会主义的祖国，其中写道：“大哉社会主义映千古，日月光华永并明，”其爱党、爱国之真挚感情跃然纸上，足见一个老知识分子宽阔胸怀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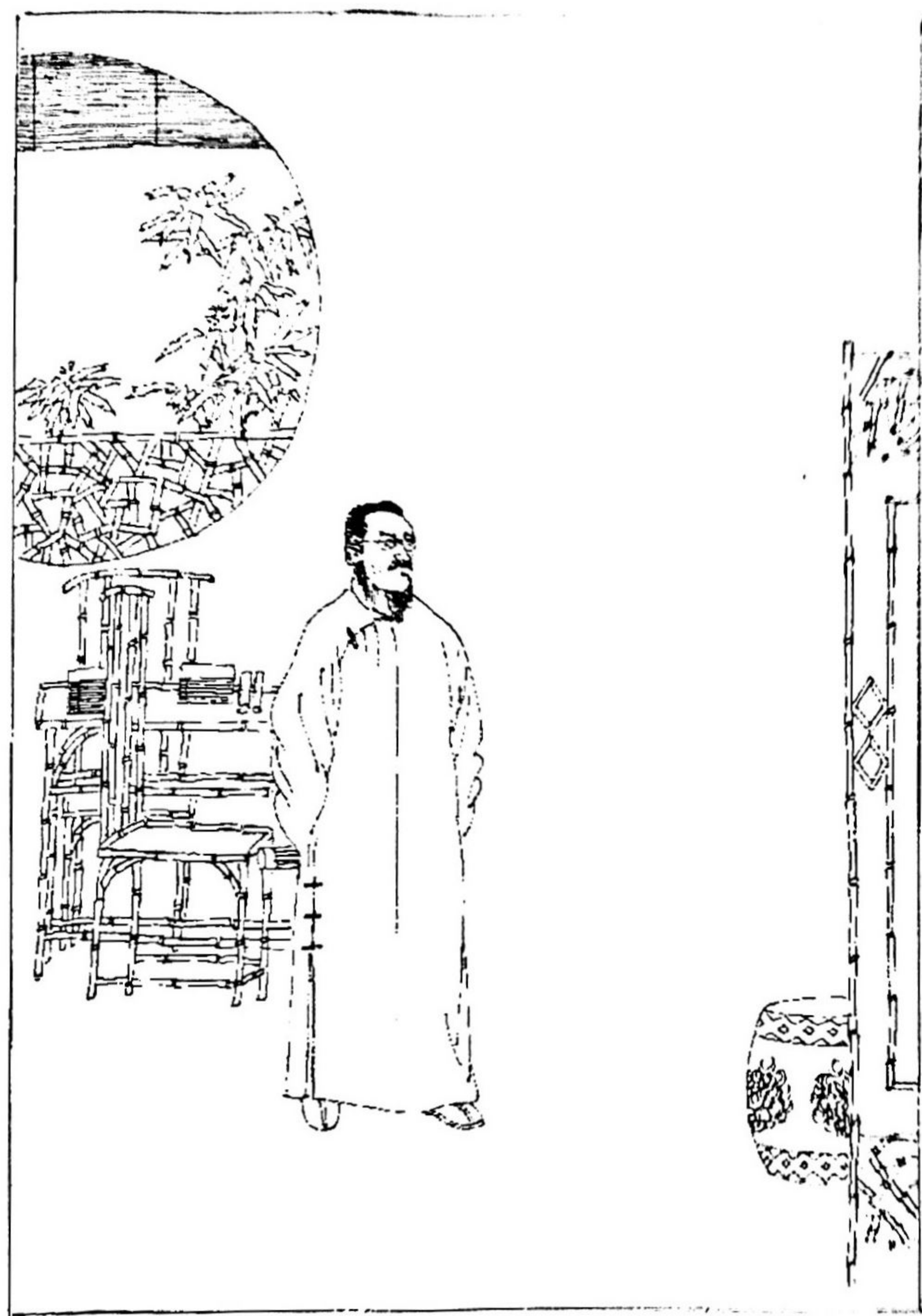
# 柳亚子二遇孙中山

张明观

柳亚子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景仰和服膺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柳亚子（1887～1958年），字安如，号亚庐，吴江北厍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09年与陈去病、高天梅等创立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1947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翌年初，柳亚子任教上海健行公学，由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和朱少屏介绍加入。他和高天梅等同住的夏寓，实际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秘密机关部。他们同负分会之责，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贮藏秘密文件，接待联络过往的革命党人。这一时期，孙中山奔波于日本、南洋等地，谋划革命，发展组织。船过上海，他总要设法与沪上盟友相聚，商讨



柳亚子像



国事。因被清廷通缉，孙氏常常无法登岸，而是通过法租界公董局（相当于租界政府）的法国友人辗转传递消息。一夕，法租界巡捕房某君前来招呼，说孙中山在吴淞口外海轮上，请诸位前往谈话。柳亚子闻讯，异常振奋。他和高天梅、朱少屏等，立即乘坐一条划子船，欣然前往。这是一次短暂而难忘的会见。在海轮上，孙中山与他们促膝交谈，共商国事。面对这位革命巨人，柳亚子满心激动，竟至难以开口，因而话说得不多。最后，握手珍重为别。柳亚子晚年有句：“崇拜英雄噤不语，扁舟渡我过芦漪。”即指这首次会见。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柳亚子搭乘司法总长伍廷芳的花车，应邀赴南京任大总统府骈文秘书。他英俊年少，风度翩翩。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外加一件鲜亮的大红斗篷，弄得秘书长胡汉民雌雄莫辨，向人打听：“柳亚子到底是男是女？”在大总统府，孙中山忙于与伍廷芳密谈，柳亚子只跟他匆匆见了一面。他在胸前别上一块盖有红印的白布，就成了大总统府秘书。这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北伐不能进行，骈文秘书并无什么工作可做。柳亚子便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喝酒做诗。这样过了三天，因病辞职返沪。走得匆忙，亦未及跟中山先生告别。柳亚子与孙中山的相见之缘，至此尽矣。他后来有句：“南都相见再相谢，三日匆匆病秘书。”即指此事。

辛亥革命以后历经艰难踬蹶，孙中山于1922年着

手改组中国国民党。柳亚子即于 1923 年底，由陈去病、叶楚伦介绍加入。在以后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柳亚子始终遵循孙中山遗教，坚决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被时人誉为“党国三仁”。1956 年 11 月 12 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此时，柳亚子已入古稀之年，且患病多年，行动困难，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政治活动。然而，怀着对中山先生的无限崇敬，他破例出席大会，并由人搀扶着，勉强上了大会主席台。

柳亚子生前有诗云：“瞻韩才两度，传钵定千秋。踪迹原疏阔，精魂尚滞留。”韩谓韩荆州，这里借指孙中山，柳亚子早年二遇孙中山，即认定了毕生的政治方向，并为此作出了终其一生的奋斗和努力。



# 王绍鏊忍辱负重为革命

吴文

1970年3月，曾任过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王绍鏊，正在病床上忍受着不能公开自己身份的煎熬。生命之烛即将熄灭，他望着围绕在身边的儿孙们，心里涌上万分的歉疚。是呵，儿女因为他——父亲的缘故，正在受到“家庭问题”的牵连，孙辈们也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告诉他们，我早在三十年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37年的党龄。之所以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党的需要呵！”他想这样对儿女说，但沉默良久，却含笑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要相信党，一切都会弄清楚的。”王绍鏊带着为党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满足和临终仍未能亲口向同志们和亲友们澄清误解的遗憾，离开了人间。

王绍鏊（1888～1970年），吴江同里人，4岁丧父，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



和民族英雄岳飞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他脑海里很早就烙下印记。10岁时，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写出《变法论》，提出了“世无百年不变之法”的口号。14岁时，王绍鏊与柳亚子同时进金松岑先生创办的同川学堂学习，以后又加入了金松岑先生办的理化研究会。因受日本清水澄著作的影响，他对议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于是，他放弃理化学习，考入江苏教育总会的法政讲习所，后又得亲支资助，于190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王绍鏊立即归国，和章太炎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开始了政治活动生涯。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天天兴高采烈地到天坛祈年殿开会。但是，希望很快破灭了。1913年11月，窃国大盗袁世凯下令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接着又取缔了所有开展民主活动的场所。王绍鏊虽非国民党员，但他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是对议会政治的极其粗暴的破坏，愤然拂袖离京，来到上海，加入反袁护法斗争。未几，袁世凯在声讨中死去，粉墨登场的还是北洋军阀的黎元洪、张勋、段祺瑞之流。在失望和苦闷中，他只身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一次打击了王绍鏊的革命热情，他曾专程赴汉口会晤邓演达，至南昌面见蒋介石，痛陈危害，希冀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的前途在何方，他坐下来认真总结十多年的政治活动生涯，清理批判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盲目信仰。他在上海买了大批日文的马列著作，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全集》等，带回天津寓所，闭门研读。近一年的刻苦学习和思想斗争，王绍鏊初步认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状，认定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大敌，他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隐隐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前途。

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他同刚结识的共产党人黄申芑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黄申芑的革命热情和远见卓识使王绍鏊深感钦佩，联想到自己多年的失败经历，他很快接受了黄申芑的正确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3年王绍鏊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在黑胡同中摸索了半辈子，才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此后，王绍鏊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活动，又介绍中共党员丁秉成等同志到吴江，与正在搞武装斗争的钱康民同志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王绍鏊一度受潘汉年同志直接领导，来往于敌伪上层，出入狼窝虎穴，担任繁重而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

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



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6月，马叙伦率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整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担任集会主席，在上海北火车站组织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并与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一起参加示威游行。

王绍整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竭智尽忠。由于党的事业需要，他长期不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解放后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活动。文革动乱中，他置自己及后辈蒙受的冤屈和打击而不顾，忍辱负重，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坚强的党性。

“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式公布了王绍整的中共党员身份，高度评价了他忠于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当今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在他的《社会学是什么?》一文中曾论及一位中国社会学家，名叫孙本文。

孙本文（1892～1979年），吴江大庙区人。他一生酷爱社会学，在社会学理论和人口学研究上颇有造诣，被誉为我国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孙本文，从小就有自强报国之志，中学时代，因敬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就将原名孙彬甫改为孙本文（孙中山名孙文），沿用一生。他出生贫寒，1915年毕业于免交学费、膳费和住宿费的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即今苏高中。接着在吴江县立小学任教。同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孙本文增强了爱国思想。他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都是同学，他们经常切磋，许多话题都涉及社会学。在众多精英中，孙本文学习成绩历年均获第一，且品学兼优，

还被选为哲学系的班长，1918年，孙本文从北大毕业，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教授国文和哲学。为了发展中国社会学，他进一步努力研学，于1921年取得公费赴美留学资格。在美国期间，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大学、纽约大学主修社会学，兼修经济学和教育学。1926年获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社会学。1929年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兼任社会学系系主任。

1928年，孙本文与游嘉德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他翻译了二十多部国外社会学著作，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同时，他又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学，先后出版了十余种专著，其中《社会学原理》最具代表性，是中国早期社会学论坛上较活跃的文化学派代表作，集资本主义社会学原理之大成。该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解放前夕，重版达11次之多，成为当时国内各高校社会学学科的教本。

学术有成就，学业无止境。孙本文早年学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偏见。后来，他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不断剖析自己的学术理论。1947年3月，他在《社会思想》杂志上撰文称：“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社会革命家，”“马氏重视经济因素，深嫉资本主义，以实行的精神，行导革命运动，其人格足感后人。”



个烫金大字。后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金诵盘4人结为异姓兄弟。

抗战爆发，金诵盘应蒋介石邀请，出任卫生勤务部部长，领中将衔，兼任国民党政府参议和考试院顾问两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金诵盘心灰意冷，他和戴季陶商议，决定辞官为民。戴劝他先辞去军职，不至于一下子与蒋介石绝情。以后，金诵盘又在南京行医，并被推为南京医师公会理事长。

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蒋介石损兵折将，东北全失，华北危急，“文胆”陈布雷服毒自杀，白崇禧等又通电逼蒋下台。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蒋开始以酒浇愁，结果痰中带血，医官陈十煜和熊丸十分担心，怕担责任，只好请金诵盘医治。经过仔细检查，金诵盘断定他不是肺病，而是烈性酒刺激食道，导致毛细血管破裂。蒋介石得知不是肺病，精神才有所好转。金劝蒋不要饮酒，蒋说：“我心里烦恼的事情太多，不得不借酒消愁呵。”金劝其与中共谈判，他哀叹说：“来不及了！”

不久，金诵盘全家迁往上海，为避免社交应酬，他在虹口的狄思威路上租了一幢小楼，很少出门。这时，周恩来派人送来一信，劝他郑重考虑，不要轻率离开大陆去台湾，并告诉他蒋介石已拟定了一个党国要员去台湾的名单，其中也有他。果然几天之后，蒋介石派行政院李秘书来说服他去台，并送来机票，被金诵盘拒绝。



接着，蒋经国又打电话来劝，金诵盘告诉他：“我实在没有必要去那个小岛。这几十年来，我虽然两度入军界供职，一次是北伐，一次是抗日。我素不参与国共两党之争，历来反对内战。何况我是一名医生，以治病救人为业，余生已下多半，我不想再离开故土，去奔波流离了。”

为了避免纠缠，金诵盘收拾行装，带全家老小回到了故乡黎里，开了一家小诊所，过起了清闲平淡的生活。解放后，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聘金诵盘为省政协委员，省爱国卫生委员会顾问，多次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

是谁最早把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的？通常认为是著名文学家郑振铎。他在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月刊上发表了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今译作《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并附有《对于战争之解释》一文。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就此进一步展开探索，又获得新的发现。比郑氏译文早三个半月，在1919年9月1日出版的，由张东荪主编的进步刊物《解放与创造》半月刊创刊号上，载有金侣琴译的列宁的《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并作译者序。该刊的第二卷第六期上还有金侣琴译的《建设中的苏维埃》（为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

金侣琴（1894～1963年），即金国宝，吴江同里人，是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的堂弟，为我国统计学权威学者。他早岁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家乡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师。

他中英文俱佳，好探索新知，追求进步。《建设中的苏维埃》一文是他在复旦毕业之际翻译的。

其后，金国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先生资助下，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统计学。返国后，曾在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和法学院任教，为国际统计会会员，著有《统计学大纲》、《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统计学》、《工业统计学原理》、《高级统计学》等书。解放前，在银行界服务多年，曾任上海交通银行副理、中交农四联总管理处秘书长、中央银行会计长等职。解放以后，金国宝先后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等职。



宋姜白石七绝《过垂虹》，脍炙人口，传唱至今，这首诗背景是，姜白石从湖州来到石湖，拜访隐居在家的诗人范成大。范成大有一侍女小红，善唱曲。因请白石制曲，当场演唱，以尽杯酒之欢。白石诗思敏捷，即席成《暗香》、《疏影》二阕，小红试唱，音节清婉，悦耳怡情。欣喜之下，范成大将小红送给白石。归舟过垂虹桥，白石诗兴大发，口占了这首七绝。诗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对于此诗末句“回首烟波十四桥”，范烟桥做过一番考证。

范烟桥（1894～1967年），名镛，吴江同里人。少年师事金松岑，后入苏州草桥中学，清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南社，并在家乡创办同南社。抗日战争后《文汇报》复刊，范烟桥负责总务并主编《文汇报画刊》。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文化处处长，后任局长，主要著作

有《诗学入门》、《中国小说史》等。

范烟桥取字烟桥，即据姜白石“回首烟波十四桥”诗意。范氏曾见过一帧姜诗的拓片，“回首烟波”并非“十四桥”，却是“第四桥”。白石另有《点绛唇》词，亦是“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同时，李广翁的《摸鱼儿》词：“又西风四桥疏柳，惊蝉相对秋语。”罗子远的《柳梢青》词：“初三夜月，第四桥春。”因而，范氏认为“第四桥”被后人误为“十四桥”。据《吴江县志》：“第四桥为甘泉桥。松陵与八坼之间，从垂虹桥数到甘泉桥，恰是第四条。桥外极深处称龙窟，水流湍急。桥北有甘泉祠，祀甘泉龙神。”《苏州府志》则载：陆羽《茶经》品甘泉为第四，桥因而得名。清雍正六年（1728年）开塘河，河水涸，见泉在桥外塘河中，水甚清冽。范氏同乡陈去病有一首七绝：“第四桥边水最清，一瓢贮就好长行。何当写幅倪迂画，寄我江湖万里情。”亦可算作一个旁证。

范烟桥博览群书，认真作文，以多思善疑的态度，考证了后人“十四桥”之误，使数百年的讹传得到纠正。

孙本忠（1897~1968年），号颀绳，吴江大庙区人。祖父孙忆轩为晚清秀才，以塾师为业。父孙祖禄为贡生，民国初年任当地小学校长。

孙本忠小时随母饲蚕，耳濡目染，萌生了爱蚕之心。小学毕业，恰值父亡，家境日窘，由长兄接济，完成苏州甲种农业学校学业。民国六年（1917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师从邹秉文，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任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技术员。在此期间，孙本忠经常到家乡宣传推销改良的蚕种。据传，他所携蚕种之蚁蚕一钱，可采茧10公斤。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由老师邹秉文的推荐和资助，赴法国留学。民国十七年（1928年）毕业于里昂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家蚕中肠细胞的生理研究》，受到国内外昆虫学界的瞩目。

归国后，孙本忠一直从事蚕桑教育和研



究，先后任江苏省农矿厅蚕丝技正、中央大学教授，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蚕桑系主任等职。他在各有关刊物发表家蚕育种方面的重要论文，为我国的蚕桑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孙本忠对蚕种改良始终满腔热情，在三十年代我国丝业衰落、蚕丝业界悲观失望之际，在电台发表“蚕丝复兴有望”的广播演说，指出，“我国蚕丝业之衰落在于国人不知随时代之进展而予改进”。他为了我国蚕丝业的复兴，不断进行改良品种的研究，即使在抗战时期，也从未中辍，同时还翻译了法国科培尼首创的蛾育选择法，使国外蚕种改良的先进经验在中国得以运用。

解放后，孙本忠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党和国家对蚕桑事业的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研究蚕桑的热情。1951年华东农林水利部开展华东全区桑蚕品种整理工作，并在镇江成立了华东蚕业科学研究所（即今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孙本忠全力支持，将中农所蚕桑系并了进去，自任研究员、养蚕系主任。十余年间，他整理出华八、华九、华十、瀛瀚、瀛信等五个品种，12个品系的杂交方式，相继选育出镇1、镇2高产优质蚕种。为规范家蚕选种工作，1955年孙本忠主持制订了《家蚕选种工作试行方案》，经农业部批准，它已成为我国家蚕育种的基本准则。后孙本忠还参与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有关家蚕育种长远规划的制订工作。

孙本忠为人谦和，兢兢业业，以振兴我国蚕桑事业为己任。节假日或埋首于办公室及蚕室，或巡察于农村桑园中。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常亲自划圈品种，亲手统计分析。他常说：“搞育种研究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他一生的实践，便是此言的真实写照。



青年人应该尊敬师长，这是毫无疑义的。而青年人又是朝气蓬勃的，当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师长意见相悖时，就不应以“长幼之伦”而放弃原则。正如一位名人所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就引出七十多年前发生在吴江的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青年诗人徐蔚南与经学大师金松岑的一场论战。

徐蔚南（1900～1952年），吴江盛泽人。现代文学家、翻译家、著名编辑。1924年，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小学推行语体文教材。这一决定在吴江受到普遍欢迎，但也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将语体文讥为“粗词俚语”，将学生学国音（即普通话）讥为“东施效颦”，并上书教育局，请愿取消语体文教材。金松岑先生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素以“旧学根底深厚”著称，即于1925年1月连发通告二件，明令在全县范围内取消新教材，恢复旧教材。通告称：“夫语言之道，根乎水土，



成乎环境，师生不出里门，强令破弃方言，以国音会话效颦腾笑，曾俳优之不如……”通告一出，街谈巷议，莫衷一是，造成一片混乱。这就引起了徐蔚南的关注。

年少气盛的徐蔚南针对通告，于3月11日在《新盛泽》报上发表了《小学校国语问题》一文，批驳金松岑的主张，他写道：“金先生的学问道德，我是非常敬仰的，但是这次他反对小学校教授国语，要重新用文言，这关系全县无数儿童的教育，所以我不得不要说几句了。”他呼吁道：“有人说中国文字与中国民众的隔离，比了万里长城还要坚固，这句话说得真对。国音国语正是图谋民众与文字的接近，奈何我县的教育当局偏偏要反对呢？”

读到徐蔚南的文章，金松岑先生甚为反感。他在《吴江报》上发表了《小学校语体文教本问题答蔚南》一文，针对徐蔚南提出的“文言文难懂”的观点，教训道：“蔚南君，我劝你新书旧书，总要热心多读一点，那就不吃力哩！”徐蔚南对此更为不服，他撰文继续与金松岑辩论。有人感到很奇怪，问道：“你平时一向很敬仰金先生，为何现在要与金先生过不去？”他答道：“我敬仰的是支持革命的金先生，反对的是阻碍进步的金先生。”徐蔚南的父亲听说儿子与长辈论战，很不赞成，要求儿子将寄出的文章收回，但是在柳亚子先生的支持下，文章最终还是在《新黎里》报上全文刊载了。

今天看来，金松岑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当

然，这不能由此“一眚掩大德”，抹杀他一生的重大贡献。年轻的徐蔚南敢于“当仁不让”，坚持进步，难能可贵。“舜湖标异帜”，这便是柳亚子先生对后辈徐蔚南的高度赞赏。



我国有两张《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这两张《文汇报》的诞生、发展，却凝聚着吴江籍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的毕生心血。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日本侵略军与上海租界当局串通，设立新闻检查所，要中国人办的华文报纸新闻先送日方审查。为此，当时上海颇有知名度的《申报》、《大公报》等自动宣布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时报》等慑于日本侵略者的威压，或噤若寒蝉，或态度灰色，为“孤岛”读者所唾弃。上海一时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在此形势下，严宝礼挺身而出，奋勇地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报纸——《文汇报》

严宝礼（1900～1960年），吴江同里人，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20岁时辍学到铁路局总稽核室工作，是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同仁会”的负责人。三十年代初，他创办“上海交



通广告公司”，经营上海市内及铁路沿线路牌广告，深受工商界欢迎，业务日益发展。由此，严宝礼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大小报的记者、编辑来往频繁，交了许多新闻界的朋友。

严宝礼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邀请佛学书房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人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共同发起，集资1万元创办报纸。为躲避敌寇检查，严宝礼决定采用洋商名义，并请友人方伯奋出面聘请当时在跑马厅的英国人克明，挂名担任发行人兼总主笔，负责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克明曾任英文《文汇报 Mercury》记者，遂决定以《文汇报》为报名，请著名书法家谭泽闾题写报头。严宝礼任总经理，实际执行社长职务。在他的努力下，《文汇报》形成强大阵容：特约徐铸成、储玉坤等撰写社论，胡惠生任编辑主任，编辑有储玉坤、吴农花、张寄涯等人；记者有邵伯南、胡道新等；副刊由高季琳（柯灵）全权主持。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正式创刊问世。《文汇报》一面世就使身处“孤岛”的爱国大众耳目一新。

第一篇社论题为《淞沪之战六周年纪念》，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号召民众学习爱国精神，共救国家危亡。2月8日的社论是《告若干上海人》，针对当时敌人将在南京筹组伪政府，对那些民族败类发出警告。《文汇报》坚持抗日救亡，敢讲真话，而且编排新款，生动活泼，副刊《世纪风》等内容进步，常常刊载进步

作家作品及反映边区、游击区情况的报道。因此该报迅速成为当时上海销路最广的报纸，受到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而敌伪当局却视之为眼中钉，采用恐吓、威胁和各种残忍的暴力手段，阻止《文汇报》的正常出版发行。

办报未满月，报馆就收到署名“正义团”的恐吓信。接着，报馆经理部挨了炸弹，营业科职员陈桐轩当场被炸死，广告科萧岫卿和毕志奋两人炸伤。随后，恐怖事件接连发生：一次，编辑部收到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一段血淋淋的手臂；又一次，有人送来一筐水果，里面所有的苹果和桔子都注射了毒药；还有一次，敌伪买通了一个印刷工人，把一枚小炸弹带进了机器房，差一点将向原《大公报》借用的，也是仅有的一台印刷机炸毁。在频频的威胁下，严宝礼坚持抗日立场，不改初衷，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奋斗。为防万一，严宝礼在报馆经理部、编辑部及排印车间，安装了铁丝网和铁门，并在编辑部附近的大方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供编辑部使用，情况紧张时，他就同夜班编辑一起睡在那里。

就在严宝礼不屈不挠冲破敌伪压力、《文汇报》声誉日隆之际，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文汇报》耍出了种种花招。国民党各派系头目为自己的政治资本，都千方百计想把《文汇报》控制在手。孔祥熙、宋子文、潘公展等企图以“资助”、“支援”为名，收买《文汇报》，但



均遭严宝礼的断然拒绝。于是，国民党就采取经济手段妄图迫使《文汇报》就范，那时，白报纸是用外汇结算的，而官价外汇掌握在宋子文控制的中央、中国银行手中，他规定不准用一分官价外汇结算《文汇报》，严宝礼只能以高价去黑市结汇，致使报纸成本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此间，克明已为汉奸丁默邨用十万六千元巨款收买，他以“经营不善、经济混乱”为由要挟严宝礼。1939年5月，《文汇报》因发表纪念“五九”国耻社论，被勒令停刊。至此，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文汇报》苦斗了一年零四个月。停刊后，严宝礼以经商作掩护，坚持不懈为《文汇报》的复刊做各种准备。1945年4月间，严宝礼、柯灵、费彝民、储玉坤等因创办《文汇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备受严刑拷打，严宝礼等坚贞不屈，后被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严宝礼因创办主持《文汇报》有功，被蒋介石授予“胜利勋章”，但他为《文汇报》复刊四处奔走，却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他只得在亲友中发动投资，经艰难筹划，《文汇报》在1945年9月重新开业。这时，严宝礼聘请宦乡、徐铸成、陈虞孙、柯灵、孟秋江、马季良、唐弢、叶以群等著名进步人士先后分任总主笔、社论委员、编辑、记者，并商请郭沫若、侯外庐等编辑周刊。1946年3月29日起，《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成为进步



舆论的重要阵地。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当局悍然下令封闭《文汇报》。

翌年春，严宝礼、徐铸成集资去香港筹办《文汇报》，在当时旅居香港的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潘汉年等人的支持下，香港《文汇报》于9月9日创刊，继续向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宣传内地革命形势。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二个月，严宝礼率先复刊上海《文汇报》，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1956年，《文汇报》一度停刊，不久，再度在上海复刊，严宝礼又任副社长兼总经理。严宝礼于1960年11月在上海病逝，生前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

## 毛啸岑参与编辑《新黎里》 张帆

毛啸岑（1900～1976年），名兆荣，吴江黎里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吴江县立第四高小任教，后任该校校长。1923年4月，这位激情满腔的有志青年，紧紧追随柳亚子，协助创办《新黎里》报，该报迅速被人称为“时代的明灯”、“地方的福音”。

毛啸岑撰《新黎里》报发刊词说：“以前底黎里，已经过去。未来底黎里，正向光明路上努力进行。本刊就是引到黎里路上底一颗明星。”在主持校务工作同时，毛啸岑积极协助柳亚子编辑该报。创刊伊始，《新黎里》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和劳工至上，气势凌厉，泼辣锐进，很快触怒了横行乡里的地方土霸。当时芦墟土豪陆某父子，飞章密告于江苏省长韩国钧，后又诬告于北京内务部，声称：“有自称李（列）宁私淑弟子之柳亚子与毛啸岑等发起《新黎里》报”，“鼓吹其劳农劳工主张，专以煽惑农工各界，希图推翻资产阶级，



实行共产主义”。6月初，《新黎里》报第五期墨迹未干，便被勒令停刊。陆氏父子自诩以打倒柳亚子、毛啸岑为“吹毛折柳”，并扬言要杀七个半头，头二名便是柳亚子、毛啸岑。面对滔滔恶浪，毛啸岑配合柳亚子，据理力争。他又奉柳亚子之命，雇一小舟，遍游吴江十八市乡，向地方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请各乡士绅联名具保复刊。同年8月，《新黎里》报获准复刊，在策略上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但顽强的战斗精神，依然一以贯之。在《周年纪念特刊》上，毛啸岑坚定地宣称：“《新黎里》是抱世界眼光的，《新黎里》是信仰真理的，《新黎里》是不畏强暴的”。《新黎里》报率先冲锋陷阵，吴江及邻县各地闻风而动。此后，“新”字号报刊纷纷并起，霞焕云蒸，一时蔚然成风。与此同时，毛啸岑在柳亚子的引导下，加入了柳亚子等发起的新南社，又由柳亚子介绍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并一度协助柳亚子主持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的工作。

1926年夏，陆氏父子再次控告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密令吴江县署立即逮捕柳亚子、毛啸岑，要“就地正法”。幸友人连夜通报，毛啸岑和柳亚子分别避走浙江西塘和同邑平望，后分头前往上海。柳亚子为此赠诗一律，云：“啸岑吾弱弟，此例到章邹；可惜同文狱，还成漏网舟。红潮新世界，碧血旧阳秋；何日冥鸿逝，同为万里游！”

在后来漫长而坎坷的革命征途上，毛啸岑一直视柳



亚子为引路人，同时他还曾得到在“四·一二”政变中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侯绍裘的教导。1958年柳亚子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毛啸岑悲痛不已。回首往事，他感慨地说：“我一生道路曲折，但终未走入歧途，都是柳亚子、侯绍裘两人的教导和诱掖”。



# 张应春血溅石头城

顾美珍

1927年春，蒋介石加快了武装政变的步伐。石头城上空乌云滚滚，酝酿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指示，3月底，侯绍裘带队，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从上海迁往南京。随后，一连三封急电，催促在家养病的张应春火速赴宁。

张应春（1901～1927年），字蓉城，号秋石。吴江北厍葫芦兜村人。时任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会委员，又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她因积劳成疾，去年冬起养病在家。接到急电，张应春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与反革命派争夺全省革命阵地的决战。她不顾身体尚未康复，也不顾家庭劝阻，毅然于4月7日离家，11日清晨从上海抵达南京。

张应春风尘仆仆抵达南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已被暴徒捣毁，多人被捕。她立即找到了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兼妇委书记陈君起（党外职务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陈



张应春烈士像



君起不知道大纱帽巷十号党的地下交通处已遭破坏，侯绍裘、刘重民等 10 人已于 11 日凌晨遭敌人侦缉队包围被捕，领着张应春前往联系，当即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

张应春等被捕后，关押于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敌人使尽了各种酷刑，他们始终威武不屈。据狱中传出的消息说，张应春被吊打一天一夜，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可是除了“我是共产党！”一句话外，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4 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将张应春等捆入麻袋，用锋利的刺刀活活捅死，当场血流如注，惨不忍睹。烈士的遗体被秘密运至通济门外九龙桥下，投入秦淮河中。这一年，张应春虚龄仅 27 岁。

上一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张应春在她主编的《吴江妇女》刊出《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宣言中说：“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只流男子的血，不流女子的血还是不够的”，“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张应春血溅石头城，实践了她的铮铮誓言。

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有一位吴江女性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她就是殷明珠。

殷明珠（1904～1989年），名尚贤，生于1904年，吴江黎里人。她出身书香门第，曾祖为道光间翰林，祖父清末在浙江乌镇为官，父亲擅丹青。13岁那年，为避吴江兵祸，殷明珠一家移居上海。

在上海，殷明珠就读的中西女学是西人办的。受环境影响，她渐渐沾染上了欧风，穿西装、跳舞、骑马等样样来得。学习成绩在校内一直是名列前茅，特别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常常令人惊叹。天资聪慧，加之相貌姣好，她的名声渐渐在社会上传扬开来。不少杂志、报刊、竞相刊出她的“美人照”。

这时，她未来的丈夫但杜宇已办起了上海影戏公司，自编自导自摄自洗，在电影界也有了点名气。但杜宇钦慕殷明珠的风范，通过他人介绍与其结识。经过几次交往，殷明珠对电



影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不久，就加入了上海影戏公司，并主演了但杜宇特地为她编写的爱情片《海誓》。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无声爱情片。殷明珠上镜投入，演技出众，此片一炮打响。

然而，她的家庭是个封建传统礼教根深蒂固的家庭，母亲思想保守，旧观念重，认为做艺人，拍电影，袒胸露臂，示人色相，大伤门风，因此竭力反对女儿投身电影界，亦竭力反对女儿与但杜宇已经建立的恋爱关系。但殷明珠热爱电影事业，已经视电影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也无法离开但杜宇。为了不伤母亲的心，殷明珠耐心劝说，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经过了整整三年，总算说服了母亲，她又重返影坛。

1926年，殷明珠与但杜宇赴杭州结婚，证婚人是叶楚伧。此后，她连续主演了《重返故乡》、《传家宝》、《金钢钻》、《媚眼侠》、《盘丝洞》等影片，成为一名妇孺皆知的电影明星。至1937年，共主演影片二十余部。声誉传至异域，南洋等地的影片商，亦纷纷订购她所主演的影片拷贝。

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影戏公司全部资产毁于战火。虽经多次复起，但好景不长，殷明珠全家遂迁居香港。1976年，她曾返沪探亲访友，以后又几次想重返家乡叶落归根，但终因身体不佳，未能成行，1989年在香港去世。



费巩（1905～1945年），原名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吴江同里人。这位曾在浙江大学任教12年的著名教授，1945年3月初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费巩于1933年秋正式应聘到浙大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还担任了2年注册课主任。任内，他在教学行政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1935年夏，反动校长郭任远以篡改考试成绩的卑劣行径，要开除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十多位进步学生。费巩挺身而出，坚决揭露了这一丑闻，与郭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但郭一意孤行，胡乔木等仍被开除，费巩随即支持浙大学生于当年开展“驱郭斗争”，罢课三十余天，终于将郭驱逐，由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继任校长。

抗战爆发，浙大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由于长期迁徙不定，加

上办学条件极端简陋，学校教学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费巩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察研究，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个长篇建议，就学校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提出具体意见。诸如关心学生健康问题，放宽贷金和推行工读以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改革学校的行政管理问题。费巩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竺可桢校长推行的导师制，并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他在改进教学、培育人才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在同事和同学中深得人心。

1940年7月，费巩以不参加国民党、不领训导长薪水的条件出任浙大训导长。任期内，除了切实推行、改进导师制，又千方百计改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当时学生晚上点的是一种当地劣质植物油的油灯，光线暗淡，浓烟直冒。费巩在自己宿舍敲敲打打，用香烟罐试制成一种加灯罩、光亮烟少的小油灯。试用以后，用自己的薪水亲自到洋铁铺里先后定做了八百多盏，分送到各学生宿舍。学生由衷感激，喜称之为“费巩灯”。在学校，费巩支持和倡议学生会举办《生活壁报》，同学们可以发表各种议论，可以批评校方和反动当局。他主张严厉清除以监视进步学生为职业的特务学生，并规定学生会的壁报编辑绝对不准泄露作者真实姓名。《生活壁报》很快成为进步学生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夜，遵义警备司令部突然向浙大校方递交一份公文，声称外地共产党潜入浙大，要在当天夜里清查户口，捉拿“逃犯”。费巩闻讯

后，迅速派人转告几位暴露身份的进步学生。晚上，他让这几位学生住进自己的宿舍，还让他们穿上自己的中式皮袍和黑皮鞋，要他们在仪容、服装方面加以改装。不久，在他掩护之下这几位进步学生安全脱险，投奔了新四军。以后，费巩还多次冒险保护进步学生。这些被营救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

人才惜人才。费巩在浙大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显示了一位爱国民主教授的本色，亦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 钱康民太湖捐躯

刘 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锦绣江南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江南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击，组织了许多游击队打击日军，其中就有钱康民和赵安民领导的“江浙太湖义勇军”。

钱康民（1907～1939年），吴江松陵人，其父钱涤根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1905年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不遗余力，北伐战争开始后，钱涤根潜回上海建立国民革命军特别行动总队，并自任总指挥，动员群众配合支持北伐。1927年1月不幸被捕，遭军阀孙传芳枪杀于上海，松陵公园内现有“钱涤根烈士纪念碑”。钱康民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而后在大革命时期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又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政治系，在大学里勤奋好学，先后掌握了英、法、日等五国语言，并接触了一些进

步书刊和革命理论，他与父亲的好友何香凝、柳亚子及中共党员廖承志、王绍鏊保持联系。就在这时期，钱康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38年10月，杭嘉湖地区日军大举扫荡，四、五百人围攻双林，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战斗异常激烈。钱康民等临危不惧，浴血奋战三昼夜，活捉日军四十多人，多次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使日军损失惨重。后弹尽援绝，钱康民率部突围成功。之后，他以突围出来的四十多人，在太湖边组建了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江浙太湖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中共中央特科派来吴江工作的党员丁秉成任政委。抗日的部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队伍仅二十多个月就发展到二百多人。他们活动在江浙接壤的吴淞、义皋、大钱一带。钱康民带兵重视对战士做思想政治工作，常教育战士“先有国，后有家”、“中国人要有骨气，誓死不做亡国奴”，鼓励战士英勇杀敌，部队士气很旺。

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烈不安。1939年8月23日上午，钱康民、丁秉成率部队行进到东太湖吴淞附近时，遭到国民党六十二师偷袭，走在队伍最前头的钱康民临危不惧，果断指挥突围。由于寡不敌众，义勇军遭到重创，钱康民左肋及前胸中弹，丁秉成腹部中弹，还顽强地用手捂着外流的肠子战斗。他们高声疾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壮烈牺牲。

钱康民革命当头，明晓大义，奋力杀敌，英勇捐躯，在吴江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柳亚子先生 1941 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烈士钱康民传》，使钱康民的英名永垂史册。





# 刘天韵评弹生涯

刘 双

刘天韵（1907～1965年），弹词艺术家，吴江盛泽人。历任上海人民评弹团团长，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

盛泽旧时就比较繁华，酒肆茶楼鳞次栉比。在刘天韵故居毛家弄口，有一畅乐园书场，江南评弹名家，屡擅胜场于此。刘天韵自小就爱好评弹，耳闻目染。一次夏莲生弹唱《三笑》，见一孩童听得全神贯注，且伶俐活泼之状惹人喜爱，欲收之为徒。这小孩即刘天韵，当时虚龄11岁，他父母初起不肯，而夏再三恳求，并许不付拜师金，便勉强答应。谁料，半年后，刘天韵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挂牌登台，艺名“十龄童”，为先生唱开篇，竟一炮打响，艺名大著。

然而，从艺之路是艰苦的。刘天韵学唱时，由师母指点，每日需学开篇一则，且要背熟为止。而当时一地说书，动辄数月，每日所唱开篇，不得重复，其艰辛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艺人，刘天韵对新生活的追求是刻骨铭心的。解放军迫近上海，当时闸北尚在激战，而他带头上电台播唱欢迎上海解放的开篇，置特务的恐吓信于不顾。建国后，他扎根于群众，放弃单干的高额收入，率先参加评弹团，去治淮工地、海岛前沿、工厂、农村，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演唱，并创作新书目，如《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小二黑结婚》等，深受人民的喜爱。

刘天韵热爱艺术，但不拘泥于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时，他为中央领导演出，弹唱陈调唱段“林冲踏雪”。毛泽东听后赞许道：“唱得好！”周恩来听后建议说：“悲哀的方面要减少些，反抗的方面要增加些。”刘天韵听后，悉心改进。今世传“林冲踏雪”唱段，已突出了林冲的满腔义愤。酷爱评弹的陈云也称“刘天韵是个好角色”。在评弹界，刘天韵被誉为“大师”。

刘天韵深知艺术是相通的，在他给学生传授技艺时常说：“要多听京剧、昆剧，以加厚底子。”他的弹唱快慢、高低、跌宕的节奏臻于完美，入于化境；他的表演酣畅淋漓，出神入化。盖叫天曾说：“我很敬佩刘天韵，他演的角色，都很神似。春夏秋冬‘四香’，其不同的性格和神情从他的口、眼、身、手中表现出来，使我对武松的表演很受启发。”

刘天韵自出科说《三笑》，对《三笑》中人物的塑造一丝不苟。他有侄女刘韵若，自小聪颖活泼，但因他

备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不许其从艺。说：“刘家第二代不吃开口饭。”后值解放，艺人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他才允许侄女正式学艺，并亲授于她，刘天韵与侄女多次合作，名声很响。1962年赴香港演出，刘天韵发病，手脚麻木，不能登台。1965年病愈重，卧床半年多，终因脑溢血逝于上海，终年59岁。

刘天韵的艺术为评弹增光溢彩，深受着人民的喜爱。





# 孙世实舍命救同胞

唐云海

孙世实（1918～1938年），又名孙方，吴江吴大庙区人。他出身书香门第，乃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孙本文先生的二子。他常说：“一个不想争第一的人，他怎能为祖国、为民族争第一呢？”小学毕业，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省立南京中学，数年后，又以榜首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

时值日寇已侵占我东北，正在蚕食华北，国难日重，民族危亡。孙世实一心救国，走出书斋。1935年底，“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和蒋南翔、黄华等一起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救亡活动。身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和组织同学跟反动政府军警展开生死肉搏，救援被抓的同学，最后以“砸坏警车罪”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出狱，不顾伤痕累累，一身毒疮，代表清华参加北平市学联大会。1936年下半年，孙世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北平学联党组领导成员。北

平沦陷！上海、南京沦陷！孙世实辗转平、沪、宁，投身抗日运动。流亡到武汉不久，孙世实被任命为中共宜昌区委书记。在此期间，与清华同学、时任宜昌区委组织委员、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韦君宜一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之间也相互爱慕，但为了抗日救亡，他们把恋情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日寇铁蹄逼近武汉，在武汉的各界人士和政府机关团体，都纷纷撤离。孙世实为了同志们安全，一直留守到最后一批。这批人员中有中共湖北省委的几位同志，还有患重病难以行走的沙宜中心县委负责干部李声簧。他们乘坐“新升隆”号轮撤离武汉西进。1938年10月23日下午，“新升隆”号轮行至湖北嘉鱼附近江面时，突遭日寇飞机轰炸，一连串炸弹，击中轮船尾部。江水涌入，船体迅速下沉。面对险情，孙世实镇定地四处指挥大家逃离沉船。最后，当他抓了一张方桌准备跳江水时，发现李声簧还在船上。见此情景，孙世实火速冲将过去，一把抱着李声簧，将他放进自己抓到的那张倒放着的方桌里，用力推向江面。这时，又见两架敌机俯冲下来，拼命扫射，正扫向船头一个小女孩。他猛地扑了过去……小女孩得救了，而年仅20岁的孙世实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12月5日，中共党组织为孙世实等25位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送了花圈，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特刊悼念死难烈士。

在生死抉择面前，孙世实义无反顾，以自己宝贵的青春，谱写了感人肺腑的壮烈篇章。正如邓颖超同志在专门写的追悼诗里赞颂的那样：烈士“失去的是他们的肉体，永生的是他们的事业精神。”





# 沈月箴无私奉献评弹艺术

徐佑永

杨振雄在评弹艺术界享负盛名，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默默无闻为评弹艺术献身，支持帮助杨振雄的知音——沈月箴。

沈月箴（1920～1981年），原名沈月珍，又名沈忆萍、费一笔，吴江平望人。沈月箴自小寄养在小学美术教师徐某家中，爱好文艺，爱好旧体诗词及评弹，也喜读旧书和各类小说，能背诵《红楼梦》中葬花词等。日寇占领平望，烧了她家房子，她随父避难黎里，曾写下了大量诗意清新的七绝诗句。她的老师王恕安在她的诗集上题署《墩隐诗草》。抗战爆发后，曾参加县护士训练班，投入救护工作。1938年8月，在上海由王绍鳌介绍加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在中共中央特科丁秉成领导下工作，并以毛啸岑表妹的身份打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开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利用机会，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曾被柳亚子誉为“吴江花木兰”。后又被派往淮南

根据地，在中共华东局情报部做秘书工作，当时该部部长是潘汉年。1944年7月，因病，经组织批准潜回上海养病。抗战胜利后，因身患沉疴，脱离了原工作岗位。但她仍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潘汉年当时来往于上海和解放区的通行证就是她从芦墟搞来的。在这期间，沈月箴结识了杨振雄先生。

沈月箴对艺术的酷爱，使她与杨振雄一见如故。当杨振雄《长生殿》初稿遗失后，不知所措，心情很沉闷。而沈月箴鼓励他重写。在上海巴条新村，沈月箴与杨振雄在灯下讨论着，疾书着。

沈月箴将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情感全部倾注在弹词艺术上。书迷们称赞杨振雄的表演够味，他的说、表、白、念样样精湛。一举手、一抬腿、一个眼神、一种身段都令人陶醉。而这些表演手段，都是沈月箴与他在灯下共同琢磨，精心设计的。听众们赞许杨振雄的弹词引人入胜，情真意切，而不少弹词的作者都署名“费一箴”，其实就是沈月箴。

上海解放了，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沈月箴满心喜悦。她对杨振雄说：“上海解放了，那些才子佳人的戏已不适应社会潮流，文艺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劳苦大众演出。”这些话，对杨振雄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他便问沈月箴：“不说《长生殿》，说什么书才好呢？”沈月箴想了想说：“还是改说《水浒》吧。这是反映农民革命的历史题材，一定会受到欢迎的。”于是，



两人又开始一起编写《水浒》脚本。

沈月箴古文功底扎实，文思敏捷，笔触老练。只要杨振雄急需唱词，她即奋笔疾书，倚马可待。一天下午，杨振雄在演出休息间，忽然想起晚上将开说的《武松·景阳岗》，尚缺一段武松上山的唱词，便急忙电告正在王家沙某家德国药房上班的沈月箴。书场散后，杨振雄赶回巴黎新村，已见桌上放着唱词，当他读到“风声疑是虎啸声”时，不禁拍案叫绝。晚上演出大获成功。

沈月箴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是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杨振雄面前，也从未透露过自己身份。五十年代，她因潘（汉年）、杨（帆）事件含冤入狱，文革中又因“历史问题”遭到迫害。当1982年上海市公安局为她平反、恢复名誉时，她已去世一年多了。但是沈月箴即使在含冤受辱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评弹艺术，全身心地支持激励着杨振雄。出狱后，更是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一片真情，帮助杨振雄整理话本。她殚精竭虑工作，却不在意书稿上署名。1983年8月，经沈月箴修改、抄写的达56万字之多的《西厢记·杨振雄演出本》终于出版。在前言中，杨振雄满怀深情地谈到“这部50万字的整理本初稿完成于1962年冬。在这始终，沈月箴同志出了大力，可谓殚精竭虑，耗尽心血，对她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只得作七绝悼之：‘三十二年共一灯，夜深旧曲谱新生。南窗切磋西厢事，付刊今朝告慰’



君。””我国出现过不少弹词作家，但从革命战士投身评弹创作的唯有沈月箴一人。



# 沈波忠心向党

徐佑永

沈波（1925～1947年），又名沈炜青、沈步青。吴江严墓（即今铜罗镇）人。他16岁入学，学业优秀，而且喜爱唱歌、吹口琴、打篮球、乒乓球。小学毕业那年，正逢“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不久家乡沦陷，母校被烧，家境败落。在国破家亡之际，沈波开始了人生的不懈追求。

1940年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陈友群先后从浙西来到铜罗开展工作。他们在青年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创办了“严墓青年读书会”，与青年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书刊，号召青年为民族利益而斗争。15岁的沈波积极参加读书会，演戏，唱抗日歌曲，印发宣传品，袭击日军，积极与地下党员一起工作。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成了沈波追求的崇高理想。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

二次反共高潮波及吴江，敌、伪、顽相互勾结，搜捕、监视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吴江。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组织安排部分党员、青年骨干撤离吴江。5月4日，王化鹏、沈波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当两人走到盛泽区大谢乡（今属坛丘）附近时，被突然遭遇的日军“清乡”部队逮捕，俩人被押回吴江日本宪兵队。敌人对王化鹏严刑逼供，而沈波因为人小，敌人未予重视，将他与另外两人同关一室。沈波与他们商议越狱。19日，乘日军看守一时疏忽，沈波等三人即卸去脚镣，从窗户逃出，那晚狂风怒吼，大雨如注，沈波等借这样的恶劣天气作隐蔽，终于逃脱了敌人的魔掌。

艰难曲折，险象环生，丝毫没有动摇沈波的理想和追求，反而愈发增强了他革命的决心和信心。5月31日，他由中共党员陈友群带领安全离开吴江，经上海、苏州转达新四军六师，随后被分配到行署“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他又只身去盐城抗大学习，但是，当他途经苏中地区，敌人大扫荡开始，盐城抗大被迫解散。于是他就留在泰东县委，负责油印工作。这份工作虽然繁琐而又艰苦，但他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常常一个人闷在屋内，夜以继日地刻钢板，忙印刷，不管严寒酷暑，不怕蚊叮虫咬，全身心地为抗日宣传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1942年3月，沈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勤奋地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在解放战



争和土改运动中表现突出，经常得到领导的赞扬。先后任中共东台县委宣传干事、青年科长兼城厢区工作队队长、时堰区委副书记等职。1947年4月，沈波在东台时堰区委任书记，带武工队去天宁乡工作，途经丁家墩子时，遭到了还乡团的伏击，而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

沈波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崇高理想。现在，当年烈士牺牲的地方有烈士墓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沈波村。